


理论与实践

ILILUN YU SHIJIAN

9



一九五八年九月

目 录

在全民学理論的高潮面前	本刊編輯部 (1)
毛澤东哲学思想的胜利	杜国庠 (3)
——从工农群众学哲学的热潮談起	
“穷、白、大”是好事还是坏事?	謝兆平 (6)
——讀毛主席“介紹一个合作社”一文的心得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韓北屏 (9)
——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一点体会	
我們是怎样学哲学的?	杨 庆 (13)
学哲学的收获和体会	胡 珍 (18)
接受“馬鞍形”教訓, 实现全民办工业	方 皐 (20)
生产大跃进中的互助协作問題	孙 孺 (23)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詭辯术	章 沛 (27)
怎样正确理解陈白沙的哲学思想	黃之流 (31)
理論学习中的群众路綫問題	张汉青 (36)
从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談起	王 琴 (38)
“二乘二等于五”及其他	顏 孙 (39)
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几个問題(續)(問題解答)	(41)
評俄譯本“中国古代思想史”(書刊評介)	苏联 維諾格拉多娃 (43)

动 态

广州哲学学会成立并开展活动
广东省工农学哲学热潮高涨
广州市举行第一次哲学报告会
广州各高等院校师生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广东省积极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工作
中山大学掀起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热潮

在全民学习理論的高潮面前

本刊編輯部

我国当前理論战线上出现的新气象，以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理論学习运动的蓬勃开展，正好应了毛主席在九年前所說的“随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會議上的开幕詞）这一科学的預见。

作为全民性的文化建設高潮的核心的理論学习运动，正是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作为經濟建設高潮的突出标志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之下出现的。当前的理論学习运动同以往的理論学习运动所不同的，是它不只是在知識分子的狹隘的圈子里，而是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在战士和普通居民中开展着的，而且，这个理論学习运动，又是以理論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中心开展着的。这个运动已經在全国、也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民学习理論的高潮面前，我們广东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采取什

么态度？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們认为，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毫无例外地、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运动中去。首先去拜劳动群众为师，去当劳动群众的学生，同时在当好学生的基础上，真诚地为劳动群众服务，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全民性的理論学习运动服务。

誰也不否認这样的事实：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的理論修养和知識；但是，在相当一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中，或則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造过来，或則由于長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們所具有的理論修养和知識，都帶着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只是古玩店里的“古董”，一放到实际斗争中去，就成为俗話說的“銀样蜡枪头”，使用不得。而广大的劳动群众，一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們就不仅能够完全正确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武器，而且能够创造出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的学习方法。已經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們所熟知的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的成績，就是最雄辯的例証。

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既然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总结和反映，也就只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最容易理解和掌握它。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中，对资产阶级“学者”是最难懂的部分，德国的工人阶级却不很費力地就能够透彻理解；毛主席的著作，虽然极其深入浅出，有人却始終学不到它的精神实质，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资产阶级“学者”似乎懂了，实际却是一窍不通。而我国的工人阶级倒是不仅能懂，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身体力行。所有这些，对于那些象毛主席所說的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了单纯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这一点，是无法不認輸的。当然，絕大多数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經在整风、反右派运动当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批判了过去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們是不甘繼續处于这种空头理論家的十分尷尬的地位的；那么，为今之計，就是不要再坐失良机，赶紧行动起来，到工人，到农民，到群众中去，和他們一起，向他們学习，改造立场观点，改造学习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首先去当劳动群众的学生们的根据。

当然，不能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們所具有的理論修养和知識都是毫无用处的。这些理論修养和

知識，只要真正与实际联系起来，并在实践中加以检查，使之成为能够指导实际的理論，仍然是大有用处的。同时，现在全民的理論学习运动，势如破竹，理論学习組織（尤其是哲学学习小組），遍地开花；而劳动群众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在理論学习中还不能沒有必要的輔導，这就需要大量的輔導力量。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改造立场观点，改造学习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本着边学边用的精神，成为群众理論学习的輔導力量的一个組成部分。而且輔導的过程，即用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又是統一的。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們应该在当好学生的基础上，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全民性的理論学习运动服务的根据。

现在已经有一些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工作人員和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人員走在前面，他們已經和

一些工人、农民的哲学学习小組建立了联系；剛成立不久的广州哲学学会理事会号召全体會員投身到群众的理論学习运动中去，并在最近举行了哲学工作者的座談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邀請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小組組長杨庆、組員胡珍同志主講，举办了报告会，帮助哲学社会科学專業工作者与工厂、人民公社的哲学学习組織建立联系等。对于推动和組織哲学工作者参加群众的理論学习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应该肯定，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

讓我們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个全民性的理論学习运动的高潮面前，迅速行动起来，投身到运动中去繼續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改造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为这个运动的最后胜利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广州举行第一次哲学报告会

8月30日上午，广州哲学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一次学术报告会，邀請广州中一烟厂第二車間主任、工人哲学小組組長、广州哲学学会理事杨庆同志和中一烟厂女工胡珍同志分別作了“我們怎样学哲学”、“学哲学的收获和体会”的报告。这是广州哲学学会成立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报告会。

报告会在广州科学館举行，出席的有广州市各高等、中等学校教师、工人、农民及哲学学会會員8百多人，广州哲学学会会长、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兼所長杜国庠同志首先講話，強調这次报告会的重要意义。他說：“杨庆和胡珍两位工人同志文化程度并不高，学哲学的時間并不長，但他們学哲学的收获和創造的学习方法，是值得知識分子学习的”。接着，他闡明了“实践——認識——实践”的公式，提出知識分子应该避免从書本到書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教条主义錯誤，而要从实际出发，象工人农民那样用哲学的武器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問題，这才是毛主席經常教导我們的科学的学习方法。

杨庆同志在报告中用具体的事例介紹了中一烟厂的工人怎样破除迷信，怎样从摸索中創造了学哲

学的方法。还詳細說明了他們在学习中的收获和体会：1.工人学哲学，要想学好，就要彻底破除迷信思想；2.要掌握理論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原則；3.要走群众路綫，不断改进学习方法；4.党委重視，大力支持，是搞好学习的极大保証。

胡珍同志在会上报告了她学哲学的經過和从学习所得的收获及体会；以自己的亲身經驗，指出工人不仅能学好哲学，而且学哲学有助于解决生产中的重大問題。最后，她強調說：“最初自己对学哲学的信心不大，现在知道学哲学的好处，对哲学小組已发生了感情，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它了”。

杨庆同志和胡珍同志的报告，都贏得了听众的热烈的經久不息的掌声。許多大学教授都認真把他們的报告記錄下来。暨南大学还当场派出代表邀請杨庆同志到該校作关于学哲学問題的报告。

会上，广州哲学学会理事杨樾同志，代表哲学学会号召全体會員并建議各高等院校教师投身到工农学哲学的运动中去，首先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场，改造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当好学生的基础上，輔導工农学哲学。杨樾同志表示广州哲学学会准备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推动这一运动的开展。

論 著

毛澤东哲学思想的胜利

——从工农群众学哲学的热潮談起

杜国庠

自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习哲学的消息以后，全国风起云涌地出现着无数工人农民的哲学学习小组，开始形成了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澤东同志哲学著作^①的热潮。这是我国破天荒的创举，是振奋人心的一樁大喜事。如果允許拿“卫星”上天来作比方的話，可以說，它（工农学哲学的热潮）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就是互相輝映的两顆光芒万丈的巨星，照耀着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路。

“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摆在我們的面前。”一年多来，由于整风、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双反（反浪费和反右傾保守）及全民整风的胜利，紧接着經濟战綫上的胜利之后，我們又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获得巨大的胜利。这就鼓起人民的“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气。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的高潮。随着工农业的大跃进，到处提出了生产技术革新的问题，迫切要求来一个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与之配合。工农学哲学正是它的一种表现。因为生产的大跃进，带来了許許多的问题，除了生产技术革新问题之外，还有管理和领导上的问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问题，人力和物力合理調配的问题，团结和协作的问题等等。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工农业生产者及其干部。问题是必得解决的，不

解决，就不能再跃进。人們这种絞尽腦汁千方百計在找寻解决办法的急迫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什么叫问题？”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說：“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沒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明确了问题的本質之后，他接着說：

既有问题，你总得贊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講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經過这种系統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不明晰，还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們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須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运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們所办的事才能

^① 主要指“实践論”、“矛盾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办好，我們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①

从这段文字，可以窺見毛澤东同志在他的名著“矛盾論”中，为什么要那么詳尽地分析事物的矛盾，为什么要強調認識矛盾特殊性的重要，而且繼之又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发表，針对着当前革命进展的情况，創造性地划清人民內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綫。这无非是及时地教导人們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决問題。因为这是客观的需要，所以，工农群众在学习哲学的运动中，也特別喜爱“矛盾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两个著作；所运用的原理也多属于这两个著作。有的工人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后說：原来这里面講的，就是我們现在做的，得到了深刻的体会。因为工农群众是最实际的，他們都希望学习了理論之后，就能够运用它去解决矛盾問題，并不是“为哲学而哲学”。现在就讓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学习小組長楊庆同志自己說明他們学习哲学的目的吧：

我們小組的同志，从来也沒有想过什么是哲学，更不敢想到要学习哲学。但是，經過整风运动和总路綫的宣传之后，职工們的思想解放了，特别是厂里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进行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的改革），我們工人当家作主的責任感进一步加强，認識到政治挂帅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为了管理好企业，发展生产，不仅要提高文化，掌握技术，还要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工人要求学习政治理論，要求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裝自己。

这个例子，是能够比較普遍地代表工农要求学习哲学的心理。但也有象上海求新造船厂一些工人那样，希望学习一点哲学去彻底批駁右派分子的各种謬論：

这种学习的要求通过反右派斗争，更为迫

切了。修造車間出了一个右派分子，他披着馬列主义的外衣，濫用哲学上的名詞术语攻击党的領導。……他硬說什么葛佩琦的反动言論是符合唯物辯証法的，是“全面观点”，相反說我們的駁斥却是片面观点。同志們听了都很气，但就是說不过他。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职工同志用摆事实講道理的办法，一下子就把这个右派斗倒了。但是，对他的每一个反动观点，从理論上分析批判仍感到困难。^②

工农同志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不太多，但却很寶貴。表示工农群众不甘于仅在政治上解决問題，还想要进一步掌握足够駁倒右派分子各种謬論的理論。它显示出工农学哲学的运动可以而且應該逐步提高的苗头，應該加以珍重培养，讓它茁壯成長起来。借以解决普及和提高的矛盾問題，因为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运动就无法进展。

当前工农学哲学的主要目的既在于提高思想、解决問題、推动生产，因此，他們的学习方法就必然要从实际出发。我觉得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学习小組的学习方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經驗：

他們既沒有上大課，也沒有按照書本上的提綱来討論，而是通过大鳴犬放，大辯論，以哲学为武器进行分析，解决实践上的問題，并且通过再实践，进一步加深对理論的認識。这一种实际到理論，由感性到理性的学习方法，我們是逐步明确过来的。

这里再介紹一个农民同志学哲学的情况，即河南登封县三官庙乡的紅專学校的学习情况。这个乡的条件很差。三十七名干部中，却有百分之九十五刚从扫盲班毕业，或者仅具有初小的文化程度。他們办了一个紅專学校，除語文和农业知識之外，还設一門哲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反对党八股”、人民出版社，八六〇——八六一頁。

社工农理論学习小丛书、二頁。

② “一个工人哲学学习小組”、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頁。

學課以滿足大家理論學習的要求。他們只有兩位教員：一位是鄉黨委書記高長海，曾在開封地委黨校和省團校學過哲學；另一位叫甄秉浩的，自學過“哲學常識”；此外就再沒有人知道哲學是什麼東西了。儘管這樣，學校還是辦起來了。開始，拿“哲學常識”做課本，逐節講解，絕大部分的人听不懂。單是“序言”一講，翻來復去，就講了四遍，學員還是听不懂。後來才突破了書本的束縛，利用實物做教材，聯繫理論，通俗解說，才聽懂了。他們的辦法也真多，搞得很熱鬧。今年四月中旬以後，他們又運用群眾大會的形式向群眾講過五次哲學，都收到很好的效果。試拿第一次大會做例子：

第一次原來是為了批駁地主的反動謬論如“窮沾富光，富沾天光”等。教員針對這些謬論進行批駁以後，又引用了民間流行的故事，生動地說明了世界上並沒有神存在。就這樣，生動活潑地宣傳了無神論。這次講課幫助群眾破除了對神的迷信。會後，八十歲的“老香頭”范隨修首先甩掉了他多年虔誠禮拜的財神爺；在他帶動下，全社群眾掀起了打菩薩和平整地的運動，一千二百三十多個泥菩薩都被送去做肥料，在平了地的土地上也種上了庄稼。⊖

在這裡，我們看到工农群眾在整風、反右派的鬥爭中吸取了大鳴大放和大辯論的經驗，摸索出一條正確的學習哲學的方法。正象康生同志在中共天津市委召開的工人學哲學座談會上所說：“他們學理論是為了找辦法解決生產上的問題。這就是從生產實際出發，經過學習理論，解放思想，然後又回到生產中去，發展生產。這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方法。”因為這種方法符合於人的認識發展的历史，符合於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

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這種學習理論的方法，不但今後將為工农學哲學的普及和提高的南針，而且也將為一切知識分子學習理論和研究科學的南針。

和工农學習理論的方法相反，一般知識分子的學習，大都重視書本，從書本出發，從理論出發，（把理論看做教條，看做包醫百病的靈藥，）學習以前，脫離勞動，脫離生產，因而脫離群眾；學習之後，仍然是脫離勞動，脫離生產，脫離群眾。結果，只能在概念或理論上兜圈子，他們所謂理論聯繫實際，也只成一句空話，不能不終於陷入教條主義的泥坑。

認真要學習哲學、學習論理的人們，對於這兩種學習方法應當加以選擇，拋棄一切知識分子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學習工农學哲學的學習方法。

目前正在蓬勃開展的全黨全民以毛澤東同志著作為中心的理論學習運動、特別是學習毛澤東同志哲學著作的運動，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精神生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當這一運動更加普及並在普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之後，還要發生更加深刻更加廣泛的影響，這種影響必將形成一種無可匹敵的巨大的物質力量，以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認真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特別是他的哲學著作；積極參加工农的理論學習，和工农一道，把學習哲學運動推向高潮！

⊖ “三官廟鄉的農民敲開了學習的‘大門’”，
學習一九五八年第十五期。

“穷、白、大”是好事还是坏事？

——讀毛主席“介紹一个合作社”一文的心得

謝兆平

毛主席在“紅旗”創刊号上发表的“介紹一个合作社”，从我国目前社会的特点，深刻的分析了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指出了广大群众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奋进的大跃进形势，这就大大地鼓起了我們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加强了我們对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

象毛主席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中所指出的，河北省三戶貧农坚决办社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样，应举社由貧穷的重灾社变成余粮的富裕社，也是今天全国七十七万个农业社的榜样。一个連年被澇的老灾社，由历年缺粮一跃而为將有一百多万斤的余粮社，在短短的时间內，根本改变了穷困的面貌。应举社社員的艰苦奋斗是全国五亿农民勤劳勇敢、大胆創造和艰苦奋斗的縮影和代表。今天大批农业社的經濟面貌都象应举社一样，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所有的农业社都是朝气蓬勃信心百倍的沿着应举社的道路迈进。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所說的，我国半年時間扩大灌溉的耕地面积，还比解放前几千年間所达到的多出一亿一千万亩，就是最令人信服的表现之一。“八大”二次會議剛結束两个多月，胜利的捷报就象雪片一样飞来；每日每时都有着惊人的創造和发明。越来越使我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內，我国广大的农村面貌，將发生根本的改变，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先进的資本主义大国，肯定地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長的时间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能够一日千里的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建設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我国社会特点在我国社会发展上所引起的必然結果。在一个拥有六亿多人口又穷又白的大国里，在共产党領導之下，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会发出惊人的巨大力量，迅速地摆脱貧困落后的状态而一跃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国。毛主席就应举社

全体干部和社員鼓足革命干劲，千方百计与大自然作斗争取得輝煌胜利的英雄气概，作出这样的按語：“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統治这块地方了。”

我国幅員广大，人口众多，經濟落后，要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实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伟大事业。毛主席在“介紹一个合作社”中，对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充滿了信心，对我国劳动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巨大力量，作了充分的估計。他說：“除了党的領導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沒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志风发。……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紙，沒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穷、白、大，这是我国社会目前的特点，无疑，这会造成我們建設中的一些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特点，又是我們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而这才是更重要的方面。毛主席在“介紹一个合作社”中就正是这样教导我們应该怎样对待穷、白、大这些特点的。

穷、白、大要求我們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在比較短的时间內赶上經濟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說，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总路綫的提出，是和我們国家穷、白、大的特点密切联系的。由于我国經濟貧困，文化接近空白，經濟基础薄弱，和我們先进的社会制度极不相称，如果我們不以最高的速度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不力爭在比較短的时间內使我們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那末，对巩固我国社会的物質基础和世界和平，將是不利的。但有些人对我国特

点穷、白、大是坏事又是好事的提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既然又穷又白，经济薄弱，基础差，设备差，建设的速度就不能快，就不能在比较短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大国；认为我国和西方工农业生产水平距离太远，要在十五年至更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生产水平赶不上消费需求，社会主义建设只得慢慢来。这里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认为穷、白、大的特点虽然是我們建设中的一些困难，但因事物并不是绝对的，只要我們善于认识和掌握矛盾的各个方面和它的变化发展，善于将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即使一穷二白，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并从这里树立了对我国建设前途的信心，最后得出能够多、快、好、省搞建设的结论；一种是认为穷、白、大的特点是我們建设的绝对消极因素，是克服不了的天大困难，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悲观失望，最后得出不能多、快、好、省搞建设的结论。这两种观点，两种结果的对比，无疑真理是属于前一种看法的，后一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既然幅员广大，有着丰富的矿藏，人口众多，就有着无穷无尽的生产潜力。我們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到处有矿可采，有地可耕。世界上的各种矿物、植物，我們都有。人口多，汇集起来的创造和发明就多，大家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就总结出六亿人民最伟大的智慧和毅力。我国在世界上有着最广大的劳动力，虽然贫困和技术落后，但也可以在比较落后的劳动工具和技术的情况下，创造出伟大的水利工程和各种伟大的建筑物，可以改变大自然，如大面积耕地的改良土壤和造林，用土办法采出千万吨钢铁等等。“滴水成河”，只要伟大的六亿人民一齐动手，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我們办不到。正因为我們穷，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我国人民就特别迫切地要求革命，富于革命精神，敢于苦干、硬干、坚决干。我国人民由于过去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买办的剥削和压迫，生活贫困不堪，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迫切要求改善生活。今天，广大的农民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惜日夜苦战，千方百计发掘潜力，找窍门。白，就是文化落后，文化科学水平低，这的确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困难之一，但正因有此困难，就会反过来，促使我們积极起来进行文化革命，而且更由于白，原来基础差，一张白紙，就容易接受新事物，大胆创造和发明，勇敢的向文化科学的高峰前进。沒有陈旧的观念和保守的思想

束縛我們，加重我們的負擔。所有這些，都使我們有可能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

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为例来说，过去曾經流行过这样的观念，认为我国经济落后，又是一个大国，技术基础差，农业机械化需要设备多，所以不可能很快机械化，因此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也就只能慢慢来。当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嚣张起来时，一部分干部受右倾思想和那种陈腐观念所支配，就要斩掉一批合作社，要合作化“赶快下馬”，要“坚决收缩”。他们从我国穷、白、大的特点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慢慢来的结论。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观点和这种观点毫无共同之处。毛主席看到我国农民经济地位特别困难，不但贫农有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且两部分下中农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只要我們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领导，我們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合作化。结果，不出毛主席所料：自从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提出批判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之后，我們党积极领导农民勇敢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大批的合作社不断地迅速地誕生，整村整乡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只经过1955年冬到1956年春这个短短的时间，就把一亿一千多万户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自今年初开始，党又号召全体农民进行农具改革，要使农业生产在短期內迅速走上半机械化的道路，结果，目前农村的农具改革也搞得轰轰烈烈，正在向滚珠轴承化发展。可以预料，不久就可实现农业生产的半机械化。

经过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各种创造发明象雨后春笋一样每日每时都在出现，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战线上的胜利消息象春天的花朵一样开遍了祖国的大地，每天都到处传播着振奋人心令人欢欣鼓舞的捷报。农业上光是夏粮就增加了四百多亿斤，我国的小麦总产量一跃而超过美国，使帝国主义大吃一惊。每亩六万斤的水稻，七千多斤的小麦，三万多斤的紅薯……的單位高额丰产出现了，而且新的记录刚出现又被突破了，一个个新记录連續出现。不但农业社获得大面积丰产，创造了平均亩产千斤社、二千斤社，而且整个县，整个专区，整个省和自治区也获得大面积的增产。每造亩产八百斤的专区，五、六百斤的省也出现不少，安徽和江苏两省现在已经成为千斤省。各地创造的农具改革，土制化肥、农药、杂交良种、改良土壤、密植、深耕等等的經驗真是数也数不清。通过现场会议、参观、评比、介

紹，互相推动共同提高，發揮了六億人民的智慧，結果得到了大丰收，創造了史无前例的惊人奇迹。工业上光說拖拉机的創造和鋼鐵生产这两項就足以使怀疑論者目瞪口呆。去年我国不过出產鋼鐵各五百万吨多一点，今年就可以增加到一千多万吨。由于發揮了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光是地方用土法煉鐵煉鋼，到明年，就可以增加鋼一千万吨，生鐵二千万吨。地方不但可以煉出鋼鐵，而且可以煉出合金鋼高級鋼。拖拉机的制造，半年時間就搞出了一百多种，預計今年就可以出產拖拉机四、五万台以上，不但中央和省一級的机械厂能制造，而且县一級的机械工厂也能够制造和日本出產一样规格的小型和中型拖拉机了。以文化科学來說，我国现在就有不少新成就，可以赶上国际水平，我国的活性染料在几年前还是“白”的一門，几年的努力就超过了英国。……数不尽的材料，举不尽的例子，都在証明了目前穷、白、大的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一跃成为世界头等工业强国而把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也远远的抛在后面。无数的动人的例子都在說明我国人口众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穷則思变，迫切要求革命的真理。三十多年長期的实践証明了毛主席最善于科学地考察和分析我国社会的特点；証明了穷、白、大是我国革命和建設的积极因素；証明我們祖國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如果现在还有人不相信長期实践証明的真理，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还抱着悲观失望、消极等待的情緒和奴隶相十足的話，那末，他就会在事实面前碰釘子、栽筋斗。随着時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胜利捷报必将說服最后一个怀疑論者。

为什么有些人在事实面前仍然不相信，却一味認为又穷又白又大的中国，只能慢慢的搞建設，对一个即將出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視而不见呢？这完全是一种資產階級思想和保守落后思想作怪。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世界上最寶貴的是人，他們迷信外国，迷信英国美国的現有鋼鐵。他們只看到我国現在的几百万吨鋼鐵，而看不到六億人民全部发动起来搞工业时的巨大力量。当他們把我国目前的鋼鐵产量和西方国家对比之后，就摇头叹气。这是最典型的早已破產了的輕視劳动人民的腐朽思想，是否認劳动創造人类的思想。他們不知道在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是人，鋼鐵是人煉出来的，机器是人造出来的，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巨大的工厂是人用双手建筑的，科学技术是人在实践中創造发明的。馬克思早就告訴我們：在生产領域中，人民群眾始終是決定性的力

量。“除了党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个決定性的因素”这个真理現在已經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实践中完全得到了証实。如果怀疑論者們能站在正确的立場把我国和美英帝国主义进行对比，就会正确地看出誰胜誰負。一个是象旭日初升的六億人口的大國，大家團結一致以高度的劳动热忱搞建設；一个是日薄西山的資本主义国家，內部矛盾重重，工人农民在資本主义和农场主剝削压迫下，劳动情緒受到打击，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經濟危机不断出現和扩大。至于那种認为人口多消費多，积累就会少，建設就得慢慢来的思想，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輕視我国組織起来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駁。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建設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們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論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們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論断。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更多、积累得更多。”他們以旧社会剝削階級只求消費享受的眼光看待劳动群众，他們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他們不了解劳动人民。共产党領導下的社会主义六億人口的大國，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的旧中国截然不同的。在旧中国，人民的力量被压制和打击；現在六億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得到了解放和發揮。他們不明白，劳动人民擺脫了階級和民族的敌人在經濟、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的压迫后，群众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风格就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消灭了剝削階級，在几千年階級压迫以后第一次把生产者同生产資料結合起来，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迅速地发展生产。劳动人民意識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因而力求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以自覺的劳动者資格出現，积极地締造着嶄新的社会。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報告說：“我国在革命覚悟高漲和革命斗争胜利的速度方面，已經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而在經濟文化发展的速度方面，也必然远远地超过它們。在历史上，永远是后来者居上，永远是暂时显得弱少的、代表进步方面的、新生的事物战胜那些在表面上似乎强大的、代表保守方面的、趋向死亡的事物。我們必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內把世界上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現在我們虽然还有穷、白、大的特点，但必須認識这也是我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积极因素，可以肯定地說，不久我国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技术的头等富强的国家。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一点体会

韓北屏

现实与真实，生活的现实与生活的真实，人类社会的生活真实与文学作品中艺术真实，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不是搞理论工作的，对理论学习得不好，了解得不多，本来没有条件来谈这样的问题；但是，一个搞创作的人，不管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总会有他的理解的，我也有我的理解。我的理解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的：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老实说，在没有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以前，我的写作生活是处于盲目状态之中的，有时凭一时的冲动写下一些作品，没有认真考虑现实与真实这一类问题；有时拾得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若干“牙慧”，却以为解决了现实与真实这一类问题了。学习过毛主席的指示之后，总算有了一些理解。当然，学习得很不好，理解得也就非常肤浅，甚至还会有错

误。我以为毛主席这一番教导，包涵着这样几个问题：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的相互关系；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的典型意义；三、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的目的性。照我的理解，这三个问题，不正是我们要探讨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吗？

“人类社会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谈的生活的现实，“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艺术的真实。它们的关系，首先是后者必须以前者为根据、为唯一的源泉，艺术的真实必须服从生活的现实，歪曲是不行的，捏造也是不行的。其次，人类的社会生活生动丰富，但是，它带有分散性和延续性，尽管是很长的长篇，很大的画幅，也不可能把它全部包容进去；文学艺术有它一定的形式和容量，它只能截取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中的一个片断，只能选取生活中的有限的人物和场景，用作文艺的表现的材料。再有，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谁都知道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样复制，那样做不但不可能而且没有意义。文艺作品必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第三，既然要有选择，要有塑造，要有舍弃，要有集中，当然就不会没有目的。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我们为什么反映了这一些，而不反映那一些？为什么这样取舍概括，而不那样取舍概括？这就接触到作家或艺术家的世界观的问题了。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革命作家必须记住：“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目的在于“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于“使人

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它的目的。

毛主席的指示，本来很明白很清楚，无论从理论方面或是实践方面去看，对我们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人类的社会生活，确是一个辽阔无比的海洋。就拿我们自己所接触的生活来说，也许是一条街、一个厂子、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是非常复杂丰富的。在生活海洋中航行，没有指南针是危险的。远离航行目标，跑到公海上等待援救，已很不妙；而把敌人的港口当作自己的漂泊地，那就十分可怕了。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说生活是简单的；相反地，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今天的生活空前壮丽，空前丰富，也空前激荡。然而，尽管如此，生活中还是有一个主流，一个本质，并非扑朔迷离如八阵图，进去就出不来。一个作家如果离开了这一个主流，离开了这一个本质，他才会迷途。什么是今天生活的主流和本质呢？说出来一点儿不神秘，那就是生活中间的社会主义力量，前进的力量。你跟着他们走，你和他们一块儿走，你就能从看去好象杂乱无章的生活中理出头绪来，否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越搞越糊涂。一切事物总有规律可寻。摸不到它的规律，或是忽视了它的规律，当然就眼花撩乱，无所适从了。文学创作亦复如是。

世界上没有任何真空的艺术的真实，也没有任何抽象的艺术的真实，它总是有一条根，总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艺术的真实到底是真实还是不真实，主要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忠实于现实生活。衡量的标准，就看作品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现实生活中间的本质和主流。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把那些反动的、错误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反掉了，把那些模糊的观念澄清了，使我们在识别艺术真实的真伪时，增强了判断的能力。现在如果要问：什么是当前生活中的本质和主流时，大家是可以很容易回答出来的。可是，在去年上半年以前，当所谓“写真实”的论调甚嚣尘上时，确曾引起一些混乱。回顾一下，未尝没有好处。

我们并不反对写真实，相反是在提倡写真实，问题是：什么才是生活的真实，怎样去表现生活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写真实”论者是有很大分歧的。“写真实”的论调，看上去似乎是“力争写真实”，反对“粉饰现实”，其实，他们恰恰是在歪曲现实。现实透过他们的三棱镜被歪曲

了，变形了，当然更谈不上掌握住本质和主流了。他们之叫嚣“写真实”，有他们的企图，他们企图在太阳中寻找黑点，然后又把这个黑点夸大，最后说太阳是黑的。我们说太阳不是黑的，他们却又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说我们是在“粉饰现实”了。这种道理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他们还有另一手，他们会把“公式化概念化”的标签贴在许多好作品上，再宣判这些作品要不得。公式化概念化当然要不得，可是我们所理解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他们也是不同的。

举个例子说吧。

那时候，有一个村子，夏收因严重虫害而减产，更受富农和坏分子的挑拨，有若干社员在怨恨，把一切的责任全归于社的领导干部，归于区委县委的领导，甚至说这是合作化带来的恶果；人们在愤愤不平动荡不安的情绪下，进行夏收夏种。到秋收时候，却得到一个丰收，而这个摇摇欲坠的合作社竟然巩固下来。乍看上去，似乎不可理解，尤其是在村子里住过的人，几个月来，听到的是难堪的语言，看到的是消极或气势凶凶的人，真不能相信这个村子里会有一个高级社。假如把这种生活写下来，的确是很可惊的；然而这种可惊的生活，竟会产生了另一种更“可惊”的结果：社会主义生根了，合作社巩固了。这中间一定有一种力量，在乱纷纷之中一定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在头绪众多的事态之中一定有一个稳定的趋向，在许多扰攘的人群之中，一定有若干人认清目标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向前走。事实确是如此。党领导着这个村子，社会主义的思想推动着人们，若干领导骨干坚持着繁杂而细致的工作，终于取得胜利。从纷繁的现象中找出本质和主流，是我们认识现实的基本方法，也是表现现实的基本方法。可是，在当时，那些“写真实”的论者们，对根据上边所举的那个例子写出来的作品，他们会说这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我们不能同意。在我们的国家里，党的力量无所不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干部的忠诚勤恳，这是最真实的现实，任怎么说也是推翻不了的；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只有深刻地广阔地去表现它们，而不是避开它们：“粉饰现实”的中心问题，在于害怕接触矛盾，畏惧困难，把一切胜利都写成垂手可得；但是，绝不能把它翻转过来，以为只写困难，只撇开矛盾，而这些困难矛盾似乎不能解决，胜利也遥遥无期，才算忠实于现实。这不是忠实于现实，恰恰是对现实的最大不忠实。

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是立

場問題；如何反映现实生活，还是立场問題。我們站在什么立场，就有什么看法和反映（別有用心的人，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們在这里不去談他）。你离开人民群众很远，从高不可攀的地方去看人民群众，他們的形象就显得渺小，象蚂蚁似的蠕蠕而动；当你走进他們中間，和他們一同斗争，才能发现他們原来有使高山低头河水讓路的巨大气魄。你跑到太阳对面去看一切事物，总是看到阴影，如果你和太阳站在一边，情况便大不相同。

生活的现实，通过文学艺术得到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反映。唯其如此，所以有人說艺术的真实比现实的真实还要真实。因为艺术的創造，虽然是根据实际生活，但使它得到美学上的加工，借最明了的形象和典型，把生活的最重要的本質的某一側面突出地表现出来，产生了艺术的美。这就是“虽然两者都是美”，而“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要求后者（文学艺术）”的緣故。

文学艺术最基本的特征，应该是真实感与美感的結合。

文学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概括，事实上是作家理解现实生活、客观地認識现实生活的結果。作家的思想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态度，通过典型形象存在于作品之中。作家在創造典型形象时，既要使它具有独特的个性，还要使它能揭示事物的本質；既要使它成为闡明思想所必要的存在，还要使它們相互之間有真实而非牵强的結合。大家都知道，除去描写真人真事的作品，絕大多数的作品是“虛構”的，可是这种“虛構”的作品却又是“真实”的，其故就在于它由类型到典型，而典型概括了类型，由一般到个别，而个别又概括了一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作品中的具体的人和事，但它帶有极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同时，文学艺术也是美学的活动，它在艺术形象中体现了现实本身的美，使它們得到更集中更强烈的表现，因而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就是反映丑惡的现象，使讀者对它們产生唾弃和憎惡，当讀者在体会对丑惡现象的揭露与鞭撻时，仍然可以得到美的享受。

我們对忠实于生活的真实的理解，不能仅仅停止在“象生活”的地步。如果真是这样理解，也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同于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自然主义拒絕对现实材料进行任何艺术的加工，从而否定用艺术手段来深刻認識现象本質的可能性，否定艺术性。形式主义則

要求这样一种对现实的“加工”，这种“加工”使艺术作品沒有客观的内容和真实，从而也沒有艺术性”。（引B·斯卡捷尔希柯夫：“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主义实现主义的文学，則是“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它有一个光明磊落的目的：“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艺术的真实具有“更理想”的特性，它不但不违背生活的真实，相反地，它是从本質、从发展的必然性去表现的，應該說，它是真实的。

話說回来，艺术的真实尽管是一个包括很多方面的問題，但是，它最根本的問題，还是作家怎么样去認識现实与反映现实的問題。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作家的思想、立场、观点，然后才是艺术的表现。

正确地严肃地認識生活，可以推动我們去探索描写真实；正确地严肃地創造了艺术的真实，恰恰最忠实于生活的真实。

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問題，即关于人物的問題。我不能說这是一个簡單的問題。它誠然需要我們付出极大的努力，极艰苦的劳动，才能使作品中的人物站得住，更不用說使它成为“不朽的典型”了。然而，說这个問題は神秘的，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而单独存在，也是不对的。

我們在生活中間总是会遇到很多人。沒有人的地方，实际上是沒有社会生活。一个作家在生活中間，对某一个人或某些人发生特别的兴趣，那是可能的，也是常见的；等到作家进行創作構思，进行写作时，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影象特别撩动自己，那也是可能的，常见的，有时甚至是必需的。然而，这某一个人或某些人，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对他們发生特别的兴趣，也是由于他們在特定的环境里的表现和作为吸引了自己；他們若毫无表现和作为，或者只是有單純的生理活动，和別人毫不相干，我想他們不会受到別人的注意，至少我对这种人不会有兴趣。一句話，人是屬於社会的。人既然有社会意义，难道根据实际生活創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可以沒有社会意义？难道我們創造人物可以不理睬社会意义？說得明白些，难道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沒有目的，只是作为架空的“艺术形象”而出现的？一个作家的“創作冲劲”，的确是复杂的，不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可是，当他們創作作品时，却有共同的問題：“你为什么要去写？”我想，我們的作家总不会說“我沒有目的！”艺术形

象归根到底要为主题服务。人物本身的发展，是逻辑性的发展，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包括他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当采用到作品中时，当作家给予典型化时，也不是毫无取舍的。要不然，简直是盲目地创作，非把读者带到五里雾中去不可。人物本身的逻辑性地发展，不是神秘的东西，更不是作者自己不能驾驭的东西。有些作家说他在创作当中，人物常常不依照自己原定的意图发展下去，却按照他本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了，作者的笔几乎控制不住，人物产生了另外的结局。这是对的，我也有多少类似的体会。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正说明作者的原定意图考虑不周到，对具体人物的发展缺乏深刻的了解，等到层层深入，尤其是人物在社会关系的矛盾中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路子不对，合理地纠正过来，使他按照他本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并不是奇怪的事。所谓人物本身的逻辑，正是生活现实的规律，使人物更符合现实生活，也就是使艺术真实更忠实于生活真实。每个革命作家，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说作家的笔控制不住人物，是艺术夸张的说法。我相信每个作家修正人物的发展方向，都是清醒的，看上去很激情，实际上很理智；看上去是作品中的人物支配作家，实际上是作家在按照现实生活的规律修改原订计划。换句话说，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规律认识得更清楚了。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要真正认识和理解生活的真实，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去观察事物，必须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游离在人民群众之外，游离在斗争生活之外，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生活，也就不可能创造出艺术的真实。

作家要在作品中反映时代，反映同时代的人，可我们并不了解时代和同时代的人，我们怎能完成任务呢？回避是不行的，扯谎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呢？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身进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工农兵生活，改造思想，改变自

己的立场、观点，庶几乎才能担负起文学事业的战斗任务。“教育诗”作者马卡连柯曾经告诫苏联作者：“只有在你亲自参加了工厂的工作，在你能体验它一切的成功和失败，在你要对苏维埃社会负责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知道你所需要的东西；不是以一个冷淡的，虽然是很注意的观察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加者的身份知道这些东西。……同时，只有作为一个参加者，你才能获得对于艺术作品是不可缺少的那种充满感情的激动的心情”。是的，只有这样走，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研究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这个问题，不是学究似的空谈，而是要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我们写作品，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大概是大家都承认了的，可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多少明白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关系之后，在实践中又将如何呢？

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教导我们：

“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又解决一个问题，不断使我们进步；才能使我们一次比一次清楚地了解和掌握现实生活的规律；才能使我们不做空头文学家。

我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我們是怎样学哲学的？

广州中一烟厂工人
哲学小组组长 楊庆

我是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小组的组长，我們开始学哲学已經两个多月了。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們学哲学的方法，收获和体会。

我們这个工人哲学小组，是今年六月下旬成立的。有组员14人，其中生产技术工人占70%，职能部门占30%，有40岁的老电工王麟生，也有20岁的青年女工胡珍；高小文化程度的占50%，其余的也只不过是初中程度，我本人是小学五年級的文化水平。这是我們小组的一般情况。

一、我們学哲学的方法

我們小组的同志，过去从来也沒有想过什么是哲学，更不敢想到要学习哲学。但是，經過整风运动和总路綫的宣传之后，职工們的思想解放了，特别是厂里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进行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的改革），我們工人当家作主的責任感就进一步加强，認識到政治挂帅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为了管理好企业，发展生产，不仅要提高文化，掌握技术，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工人迫切要求学习政治理論，要求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

面对着工人群众这种可贵的政治热情，我厂党委根据区委的指示，在六月下旬召集一部分工人开座談会，征求大家对政治理論学习的意见，并向大家提出：“我們成立哲学小组好不好？”談到学哲学，不少人被吓怕了。当时很多人对哲学有迷信思想，以为哲学是一門高不可攀的理論，只有那些懂得天文地理的大学生才敢碰它。电工王麟生說：学哲学是理論家和科学家的事，我們工人大老粗怎么学得了呢？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党委就向大家介紹了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习哲学的經驗，用事实說明哲学并不神秘，具有丰富生产知識的工人階級是能够学好的。經過这样启发，工人們受到了鼓

舞，立即就議論开了。有的說：上海的工人能够学习哲学，为什么我們不能学呢？于是当场就有十多人自愿报名参加学习哲学，党委立即表示支持，便决定成立我們这个哲学小组，并决定由我担任学习小组的组长。

哲学小组成立后不久，厂里文化学习开始了，于是有一些组员又动摇了，他們仍然怀疑学哲学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在“学文化好呢还是学哲学好呢”两者之間犹豫不定，李殿坚同志就给自己开了后門，准备万一学不下去时，就轉学文化。我自己也有动摇，認為文化低，还是先提高文化吧！加上那时候旁人冷言冷語，說什么“楊庆，你也学起哲学，不簡單呵！嘻嘻……。”这些話虽不帶有惡意，但听了却有点刺耳。党委分析了这个情况，認為：如果组员对学习的目的和学习方法不明确，是不能保証学习好的。因此，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又召集大家开会，反复向我們強調工人学哲学的重要性，要我們破除迷信。再通过大家互相检查酝酿，明确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思想，搞好生产，学习方法要坚持理論联系实际。于是，一种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的感觉使我們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哲学。思想一解放，事情就好办。以后的事实証明了，以为哲学高不可攀的自卑思想完全是多余的。我們工人不但能够学哲学，学得好，学得快，而且，从我們工人的丰富的实践經驗出发，我們創造了我們工人学习哲学的方法。这說明了哲学产生自实践，而且是我們工人自己的理論和學問。

我們的学习方法：就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先談生产中的問題，把問題摆出来，再到毛主席的著作中去找理論根据，对这些問題进行分析，得出結論，再回到生产中去指导实际。但是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我們思想上不是十分明确，而是通过实际摸索，逐步加深体会的。在研究学习方法时，我們曾經考虑过几个意见，有的說要請人講課；有的說学习要有次序，不能东拉西扯。打算在七月份先学

习总路线，打个底，八月份转入系统学习“矛盾论”，逐章逐节学下去；还有第三种意见，多数人认为不要理论一套，要从实际出发。李殿坚同志说：“我们工人是最讲实际的。”我当时觉得后一个意见好。但是怎样入手呢？没有经验。后来找辅导员商量，决定在摸索中前进。正式学习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没有上大课，而是叫大家先摆情况，谈问题，然后集中问题，确定辩论题目，经过阅读毛主席的文章之后展开辩论。这样一种从实际问题开始再提高到理论原则上去分析的学习方法，同志们很感兴趣。门路摸对了，以后每次学习，都是先让组员从生产、生活当中提问题，然后按问题的性质去找理论，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展开辩论，从而达到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

两个月来，我们既没有上大课，也没有按照书本上的提纲来讨论，而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哲学为武器进行分析，解决实践上的问题，并且通过再实践，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的认识。这样一种由实际到理论，由感性到理性的学习方法，我们是逐步明确过来的。特别是区委和市委先后在我厂开过现场会议，又把这种学习方法肯定下来，对我们的学习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种学习方法是实践——理论——实践的方法，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方法的。

二、两个多月来学哲学的收获

两个月来，我们就是坚持这样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从生产、生活当中提出课题，运用哲学上的矛盾的普遍性、内因和外因、主观与客观、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原理讨论了七个问题，同志们感到收获很大。总的来说，就是促进了生产，改进了工作，提高了认识，解决了思想问题。现在我就这四方面，举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第一，认清大跃进的形势，知道了原来生活中就有哲学：

在第一次学习会上，我们不是先由辅导员讲课，而是让大家自由地谈思想，谈生产上的问题。这样一谈，问题可多了。首先有人提出：在生产大跃进中，工厂要来个一厂变三厂。新建的机械厂和农药厂需要机械工人，领导从第二车间抽调一批卷烟司机去充当。司机一调走，助理司机升为司机，加烟丝工升为助理司机，又从别的车间调人来顶替加烟

丝工。新提升的工人，因为技术不够熟练，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有些组员发出了怨言，说领导调动不合理，不照顾第二车间，……谈了半天，忽然有人提出：“这算什么哲学？还不是生产会议？”大家被他这一提，也糊涂起来了。这时辅导员便给大家解释道：生产中的各种现象；细细研究起来，里面就包含着哲学的道理。大家翻看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矛盾论”一读，找到了矛盾的普遍性这一问题，心底明白了；原来马列主义哲学，就是研究事物矛盾规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有哲学。于是我们便抓住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展开了辩论。一部分同志认为：调动劳动力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变动过大，削弱了第二车间原有的技术力量，并且影响了工人的团结，完成任务没有信心，这样做就是不够全面考虑问题。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相反，认为这次劳动组织的大变动，无论从需要和做法方面来说，都是应该的，否则，一厂变三厂就不可能。经过反复争论，终于统一认识，大家认为：技术力量不足是由于生产大跃进，打破了原有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力量之间的平衡，因此新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矛盾。如果解决了这个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取得统一，由不平衡到平衡，就意味着生产向前发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要保持旧有的平衡，那就不可能实现生产大跃进。矛盾抓住了，大家又进一步分析，认为只有更好更快地培养技术力量，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领导上大胆地提拔一批技术工人，是符合要求的。至于新提升的工人，通过生产实践和技术学习，就可以逐步提高技术的熟练程度。经过这样具体分析，大家的思想开朗了，认识到这就是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的道理。于是大家又反复阅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这一段话，不懂的地方，由辅导员来解释。

这次学习会，对同志们的启发也很大。初步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的哲学原理，知道那里有问题，那里就有矛盾的存在。大家认识到在生产 and 生活中就有哲学，认识到哲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学习信心加强了。正如胡珍同志所说：“由于这样学习能联系思想和生产实际，解决问题，现在就是赶我也不愿离开哲学小组了。”

第二，运用哲学武器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了生产，改进了工作。

我们工人阶级是最讲究实际的，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而且还

注意貫徹學用一致的原則，學了就用，邊學邊用，學一點就用一點。經過兩個月的學習，我們小組的同志已經初步掌握了一些哲學原理，並且開始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同志們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原理之後，就運用這個原理去觀察和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現象，解決生產實際中的矛盾。第二車間生產組長周樹泉同志，過去雖然知道自己小組里有一位助理司機和司機鬧不團結，影響生產，但沒有積極幫助他們搞好關係。學習之後，認識到這是先進與落后的矛盾，需要解決。由於他正視了矛盾，就能夠積極採取措施幫助他們，通過個別談話，小組批評等方式提高他們的思想，從而消除成見，搞好團結，促進生產。到8月23日為止，該機已經超額兩箱香煙完成了8月份的生產任務。周樹泉同志還運用先進與落后的矛盾的理論，分析了自己小組第四號機和第五號機的情況：四號機每月都完成生產任務，五號機卻經常完不成任務。他相信這兩個機台在技術上也存在着先進與落后的矛盾，就注意發動技術高的工人去幫助技術較低的工人，召集兩個機台的工人開座談會，訂立互助合同，從而提高了工人的技術水平，解決生產發展和技術落后之間的矛盾。又如在今年7月份，第二車間發生三件工傷事故，我沒有全面分析事故的原因，就心急起來，為了消滅事故，就決定一律禁止在機器運轉時清掃機器，凡是不遵守這一規定的，當違反操作規程論，出了三次工傷事故，就要自己負責一切藥費。這個決定向工人宣布後，大家很有意見。有的說：我們工人只想搞好生產，誰也不願意被機器剋傷。有的說：如果生產時不准掃機，那我不參加班後會（我廠每天下班後就開班後會議，如果下班後清掃機器，要花半小時。這樣，他們就來不及參加班後會議）。姚立聽了這些反映，認為我做的這一決定是主觀主義的。他就把這個問題提到學習會上來讓大家辯論，當初我還作了一番解釋：“我是為工人着想的啊！”但大家認為我這樣不問具體情況，機械地規定機器運轉時不准掃機，是主觀片面的。因為卷煙機有些部分在運轉時掃機是不會發生工傷事故的，如果在運轉時不掃機，就會使卷煙機積油和積塵，影響香煙的質量。正確的是應該明確規定，危險的地方才不准掃。同時，消滅工傷事故不能採取簡單的行政命令方法，應該加強安全生產的教育，使工人自覺地注意安全。這樣有理論有實際的分析問題，句句話都打中我的思想要害，使我認識到自己急躁、主觀主義的毛病，當時我高興地喊了一聲：

“今晚我又多了一個收穫。”當我認識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方法是主觀、片面的，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以後，第二天，我便在廣播站向職工宣布改變原來的決定。學哲學真能解決實際問題。

在學哲學當中，我們個人的認識提高了，干起工作來就更有把握。當胡珍同志懂得了社會矛盾方面包括有非對抗性的矛盾和對抗性的矛盾這個哲學理論後，就運用這個武器來分析目前的國際形勢。她說：“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這種矛盾互相鬥爭着，最後發展為革命。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是不可抗拒的理論根據，也是社會的發展規律。我過去對中東局勢的認識是不很清楚的，現在才理解反殖民主義鬥爭必然勝利的道理。”她懂得了這些道理之後，每天廣播時事的時候，就能夠針對工人中對目前國際形勢問題的思想情況，有的放矢的進行宣傳。

第三，大談內外因，找到了生產計劃變動的道理，消除了埋怨情緒，上下左右大通氣。

有這麼一件事：我們廠里的生產計劃經常變動，特別是日作業計劃，往往是今日安排好，明天就改變，結果影響到產品質量。對這件事，工人們很有意見。有的說：“計劃這樣無用，干嗎還照它辦？”可是職能幹部在解釋這個問題時總是強調客觀原因。這個問題，在我們廠里始終都沒有得到一致的認識。於是有一個組員便把這個問題提到哲學小組來辯論。和前面所爭論的問題一樣，開始時也出現兩種不同的對立的意見。負責計劃工作的鄺文飛同志認為計劃的經常變動，是由於客觀原因，如原料供應等問題所引起的。但也有人認為是由於工作中協作不夠和執行計劃時沒有切實掌握工藝規程的各個環節而產生的。這樣就引起了關於事物變化中內因與外因的關係問題的爭論：計劃受客觀形勢的影響，但只談外因對不對；計劃的好壞，應從那裏去找原因？內因在計劃中起着什麼作用？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大家又從毛主席著作中找武器。同志們深入鑽研了“矛盾論”之後，懂得了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與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的根本區別，立即展開辯論。胡珍同志說：“從發展觀點來看，計劃的變動，是不可避免的，計劃是受到外因影響的。但從我廠的情況來看，更主要的是由內因起作用，很多時候是由於主觀努力不夠而造成不必要的計劃修改。如果不顧事實，片面地強調外因影響，那是形而上學的观点。”許多同志還在廠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擺出具體材料，說明內因有着很大關係。有的同志舉例說：今年6月份“好景”牌香

烟，原定計劃是24日開始撕葉，經過兩天發酵，26日就可以卷到香烟。但由於計劃部門沒有及時檢查，結果第一車間到25日才着手撕葉（當時廠里有烟葉庫存）。由於第一車間拖延1日施工，使上下工序的生產脫節，第二車間因26日那天沒有“好景”牌子的烟絲供應上來，就不得不要臨時修改當天的生產計劃。由於機台一拆一裝，就浪費了人力和時間，也影響了產量和質量。又如7月份“北冰流”薄荷烟，也因為臨時沒有薄荷露而取消任務，改為卷制“千里”牌香烟，但是沒有這個牌子的烟葉，又轉“家家樂”，而這個牌子的香烟已經超過了計劃數。接着大家分析：象這種作業計劃變幻無常現象，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可是計劃部門沒有盡到主觀努力。因此，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我廠計劃的經常變動，多數是內因在起作用，是由於主觀努力不夠。同志們掌握了具體材料，又根據毛主席的思想進行分析，最後大家也就一致認識到：生產計劃的變動，是由於生產的發展而引起的，那是正常現象。如果是因為主觀安排不恰當而破壞了生產的平衡，那是反常現象。應力求避免。象我們廠的生產計劃和實際執行脫節這個矛盾的產生，雖然受到外因的影響，但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編制計劃時應儘可能符合客觀實際，並且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注意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的連系。但是，從發展的觀點來看，修改計劃又是不可避免的。經過這樣的討論，同志們認識了問題，更加深刻地理解內因和外因的作用這個哲學原理。

通過內因和外因的作用的爭辯，同志們認識了計劃變動的道理，因而在日常生產中就採取正確的態度對待計劃的修改。第二車間主任說：過去我召集生產組長開會，大家經常因為計劃的變動而向我埋怨，我自己也思想不通。現在碰到這些問題，首先自己去分析產生的原因，如果確實是客觀上有困難而正要修改計劃不可，我就向生產組長解釋，並通過他們再向工人講清道理，消除大家的埋怨情緒。如果是計劃部門沒有盡到主觀努力，我就積極提出建議，要求他們切實改進計劃工作。負責計劃工作的鄺文飛同志，現在也經常深入到車間和生產小組加強聯系，做到上下通氣，所以近來的生產計劃比較積極可靠了，執行也比較好，工人中的埋怨情緒也隨着減少了。

第四，思想問題碰到哲學，豁然開朗。

卷烟司機姚庭立當上技術革新領導小組副組長時，工作非常積極，後來覺得領導不信任自己，於是情緒低落，甚至不想干。他把自己的思想談出來

之後，我們在学习主觀與客觀的辯證關係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幫助他分析，指出他看問題片面，從個人的主觀願望出發去對待工作，因而產生冷熱病，甚而懷疑組織，這是一種唯心主義。姚庭立同志学习了哲學中的主觀與客觀的關係這一理論後，在工作中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懂得全面地、冷靜地去分析問題了，工作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最近，領導上把他機台的加絲工調走了，另從其他車間調個新手工人工人替補，因為工作不熟練，在生產上增加了一些困難，但他不象過去那樣脾氣大了，而是想辦法去幫助新來的工人，耐心給予指導。通過學習，也幫助周樹泉同志克服個人主義思想。他在學習前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有懷疑，對苦戰有抵觸情緒，認為過多地占用了自己的休息娛樂時間，心里有意見又不敢說出來。學習後，他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是客觀存在的一個新形勢，而自己在思想上與這種形勢不相適應，多占用一點業餘時間做工作就不滿。他馬上就意識到這裡面存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把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因而自覺地消除了自己的抵觸情緒，積極參加社會工作，有什麼困難就主動找行政和領導商量，想辦法把工作做好。

同志們懂得了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的理論之後，就不再害怕矛盾，而是正視矛盾，解決矛盾，把工作推向前進。如搞宣傳工作的胡珍同志，近來因為工作不夠好，受到工友們的一些批評，怎麼辦呢？她說：“如果在過去聽到这么多的批評意見，心里就會慌亂起來，不知怎樣做工作才是。現在学习了哲學，我知道這是群眾的要求和自己的主觀努力不夠之間的矛盾，群眾所以提出批評，一定是自己工作有毛病。要解決矛盾，就不能在碰到困難時縮手縮腳，應該虛心接受群眾意見，改進工作。這麼一想，工作信心就提高了。”

三、我們的體會

我們的哲學小組成立還不很久，雖然有些收穫，但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提高和深入。我這裡僅就我們這短時期學習哲學當中，談談我們的一些體會。

（一）工人學哲學一定能學好，迷信思想要徹底打破。

過去有人認為哲學神秘，工人們更有自卑感。更有些人認為工人根本就學不好哲學，這是瞧不起我們工人階級。

从我們两个多月的实践証明，哲学并不是神秘的，富有生活經驗和生产知識的工人階級，完全可以學得好，用的好。哲学是有階級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學說，既然是工人階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它就一定能够被广大的工人群众所掌握，变成改造世界的伟大的物質力量。一切科学成就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總結，应该被劳动群众所掌握。根据我們的体会，哲学不是写在書本子上的，而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正因为这样，我們在短短的两个月時間的學習中，就能够初步掌握了一些哲学的原理，并且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最近，我們哲学小組有四位同志被吸收为广州哲学学会的會員，我本人还当选为广州哲学学会的理事，这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光荣。我們要打破对哲学的迷信思想，大家組織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學習哲学。

(二) 我們能够学好哲学，用好哲学，还在于我們紧紧地掌握了理論联系实际，學用一致的原则。

我們由于正确掌握了实践——理論——实践的學習方法，就能够學習得好。我們的体会是：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書本出发。就是說，學習哲学的时候，首先要抓住当前生产和工作中为大家所关心的問題，然后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武器，运用哲学原理去分析实际工作中的問題，得出結論，再回到生产中去指导实际。由于这些問題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旦把它和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大家就容易理解問題，并且相信，哲学上的道理确是从我們的經驗中總結出来的。

为了更好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學習方法，我們克服了依賴上課的心理，采取集体自修閱讀文件，鳴放辯論的形式，这就更能發揮大家敢想敢說精神，开动腦筋鑽研文件，思考問題。在學習过程中強調暴露思想，辯論时对事不对人，使大家解除思想顧慮，敢于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問題。这样，就把學習理論，研究工作，思想檢查結合在一

起。

(三) 走群众路綫，不断改进學習方法，会前充分准备，会后注意總結。这也是我們學習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們的學習方法，就是通过群众討論，在群众的“講实际”的要求下創造出来的。

學習开始以后，小組長經常与組員联系，征求大家对學習的意见，及时改进學習方法。例如有的組員提出：單靠自己看文件有困难，要求每次閱讀文件后，由輔導員再解釋一下文件的中心思想和有关的名詞、概念。后来採納了这个意见，就請輔導員帮助大家克服學習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扫除“攔路虎”。小組長还团結几个學習积极分子組成核心，經常碰头研究怎样搞好小組學習，特别是每次辯論之前，我們就先开核心會議，确定一些能够保證开好學習討論会的措施。此外，我們在學習过程中也不断注意調动大家的學習积极性，先后开过两次座談会，一次是專門談學習收获，使大家看到成績，提高信心；另一次是專門檢查各人的學習表现，提出今后保證，逐步消灭了學習不發言的空白点。

(四) 党委重視，大力支持是搞好學習的最大保證。我們哲学小組是在工厂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起来的，指定車間支部書記当學習小組長，保證了學習時間。上級党委也是很重視的，区委宣传部还派了一位科長来当我們小組輔導員，还有省市的領導同志也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励。如果說我們小組有什么經驗和收获，那是和党的領導分不开的。

最近，我厂党委会已經作出决定：要扩大組織更多的工人學習哲学，現在已經有二百多个职工報名参加了學習，全厂共有18个哲学小組。我們相信，广大工人同志爭取學習哲学，將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速度加快一步。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貢獻我們更大的力量，为了尽快地把广州建設成为华南的工业基地，我們工人將要来一个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友誼竞赛！

学哲学的收获和体会

广州中一烟厂工人
哲学小组组员、女工 胡珍

我学习哲学还只有个把月的时间，但时间虽短，收获很大。检查一下这段时间的学习，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现在谈的就是我学哲学的收获和体会。

今年六月间，我就从报纸上知道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学哲学的消息，觉得很新鲜。不久，我们厂党委也提出要搞一个工人哲学学习小组，并向我们介绍了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哲学的经验；说工人学了哲学，就能更提高思想，做好工作，推动生产。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想呢？我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

说实话，报名参加的时候，我只想到学哲学的好处，还没有考虑能不能学，有什么困难。后来一想，不是大家都说哲学是一种很深奥的科学吗？象我这样文化水平很低，什么也不懂的人，能学哲学吗？这一想，心里就慌起来，暗想还是学文化算了。但又想到：既然报名了，又带头退出，多不好呵！这时，党委和辅导员同志鼓励自己，说只要有决心，具有丰富生产知识的工人阶级是一定能够学好的。这样，我才坚持下来。不过，还是怀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学哲学的。

我们是七月初开始学习的，到现在虽然时间不长，但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有劲头，体会到哲学的用处真大。现在，怎样赶我也不离开我们的哲学小组了。

我是最近才担任厂的基层工会的宣传委员的，当时心里就有点怕，怕工作做不好，怕工友意见多。果然，二个多月来我虽然努力工作，但还是有不少工友对我提了很多意见。要是在过去，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一定会埋怨说，我这样辛辛苦苦地工作，为什么还招来那么多的意见，而且会因此感到苦恼，以致影响工作情绪。现在，我不但没有这种埋怨情绪，也不感到苦恼，而是平心静气地来分析同志们的意见，信心百倍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为什么我能这样来处理问题呢？因为我学了哲学之后，懂得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和“每

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的道理。我知道群众对我的工作有意见，主要的是我的工作还赶不上群众需要这一矛盾的表现；同时，由于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方法还赶不上大跃进的客观形势的要求，虽然自己努力工作，仍然存在主观能力与客观要求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工作过程中是必然会发生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应该是消极的埋怨和苦恼，应该是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方法。这样，矛盾就能解决，能力就能提高，工作也就能向前发展。而且，在新的情况下还必然要产生新的矛盾。矛盾再解决了，工作也再向前发展。正是这个哲学上的道理，帮助我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我正准备深入群众；和同志们研究改进广播工作和俱乐部工作。这样，我就把群众的意见，变成一种推动工作的力量，而不会变成一种思想上的负担。

最近，有很多工友取笑我说：“小胡，你的工作室为什么搞得这样干净呀？”是的，比起过去的工作室，现在是干净得多了。原来过去我总是强调客观困难，总说没有时间动手搞清洁。虽然过去也有人提过意见，但我原谅自己：有什么办法，我挤不出时间来呀。自从懂得了“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的道理之后，我就有另外一种想法：没有时间虽然是客观原因，但我是不是已经充分地发挥了主观的能动性了呢？这一问，可把自己问倒了。于是，我就重新把自己的时间好好安排一下，一天收拾一点，用不了几天，就把个工作室搞得干干净净。这个事实教育了我，懂得老是强调客观困难，就什么工作也做不好。不是么？现在谁不忙呢？其实，问题主要在于思想重视不重视，思想重视了，就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潜力。我这里举的例子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这个道理，在大事情上也行得通。我们的工厂，在大跃进中，一厂变三厂，要搞机械厂，还要搞农药厂，起初还不是有人强调这样困难，那样困难，可是，一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困难解决了，工厂也就办起来

了。当然，客观条件也是要考虑的，但是，客观条件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呀！

又比如，我們哲学小组学习的第一个晚上，是談思想，摆情况。大家都在会上摆了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摆了一些生产上的情况。如由于一厂变三厂，要从原有生产单位調动一批技术力量到新厂去，这样就影响了原有厂的技术力量，发生了問題。又如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但业务不熟悉，于是又产生了問題。当时我就想，这究竟是什么問題呢？这些問題与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生产的情况和問題摆出来了，我們就学文件，看毛主席的著作，找理論根据，以便对这些問題进行辯論。辯論时，就提出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但不懂业务，算不算矛盾呢？有人說不算矛盾；但有人說这是矛盾，因为不懂业务，就是主观認識和客观实际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学习业务知识，这样才能做好工作。又比如談到大厂生小厂后，人員調动显得紧张，这是什么問題呢？过去我們对这事會埋怨过领导。其实这是好现象。在大跃进时代里，工农业迅速发展，要大办工业，大厂生小厂，这是必然的现象。我們厂也生出机械厂和农葯厂来了。既然要办新厂，就得抽調一些人出来搞，这就产生了新厂和旧厂人員与技术力量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从原有水平上提高，培养新的技术力量，来补充技术力量不足的地方。第一个矛盾解决了，跟着出现了新的矛盾。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沒有绝对的平衡，只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矛盾斗争，才能促使事物的发展。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規律。通过这样的辯論，使我明白，在我們工作中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只要很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能够很好認識这些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矛盾发生时，也不致惊慌失措。再經辅导員的帮助，把这些問題提高到理論上去分析，使我們进一步認識到原来在生活中就有哲学，原来这些就是哲学的原理。通过学习哲学，掌握它的真理，就能分析工作中的实际問題，对我們处理問題，做好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这次学了哲学之后，才知道自己在工作上犯过主观主义的錯誤。

我担任的是工会的宣传工作，在工作中必須貫徹党委的意图，这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不过，問題在于怎样来貫徹党委的意图。过去，我一接受了党委的工作任务之后，就一个人关起門来想一套办法，然后就开个大会，照自己想的一套布置下去。这样，任务是布置了，可是执行起来却常常碰到許

多問題，有时因此感到很苦惱。学了哲学，我才知道这叫做主观主义。因为人們的主观認識如果不符合于客观实际，或者脫离客观实际，就是主观主义的。我在布置工作任务的时候，沒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不去听取群众的意見，怎能不犯主观主义呢！碰到許多問題，这是必然的。现在我知道要在宣传工作上更完滿地貫徹党委的意图，必須首先深入了解情况，然后才提出自己的意見，这样才能更順利地完成任務。因此，最近我們开的一次工厂的宣传工作会议。我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做法，首先传达了党委的意图，然后請大家摆摆情况，提提意見，經过了充分的酝酿，把党委的意图变成大家共同的要求，才作具体的布置。实际的效果証明这才是辯証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也是我在学了哲学才自觉地掌握了的工作方法。

总之，学哲学对我來說，还是刚刚开始，哲学上还有很多道理，不是一下子就都能学懂，还需要逐步提高；但就是我现在已經懂得的这些哲学上的道理，对我的好处已經很大了。我完全有信心在现在的基础上繼續学习，直到完全地掌握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工人階級的理論武器。

从这短短的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

(1)要明确学习目的：我們工人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懂得些名詞术语去吓唬別人，而是为了懂得更多道理，要懂得能够解释世界的道理，要做更多的事，这样，才能努力、热情地学习。

(2)要联系实际。如果离开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就很难懂，而且要把每一个論点結合实际来研究討論。我們小组都是由于結合了生产实际情况才使我們对問題有比較深刻的領会。

(3)要运用。因为哲学就是道理，就是工人階級的真理；它不是只能解决个别問題，而是可以解决普遍的問題的，甚至可以拿哲学原理去解释世界上一切問題。只要我們不生吞硬搬，就一定会在生产、工作、思想方法上去运用和掌握。

(4)要破除迷信。学习的时候，要大胆发言。初时，我很怕发言，后来，大胆地試了一下，发了言，觉得还可以，这样，每次都发言，把自己認為对的都談出来，結果經过大家討論，有不对的就收回服从对的意見。我們工人学哲学就是不要怕，怕就妨碍了我們的学习，有什么可怕呢？哲学就是我們工人階級斗争的总结，我們学习就是为了少犯錯誤，提高認識，更好地担負党的任务。我們說：哲学这一門科学我們應該要学，而且可以学好。

接受“馬鞍形”教訓，實現全民辦工業

方 鼻

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的光輝，照亮了我國勞動人民的心，人人振奮，干劲沖天；而當人們發揮了這種主觀的能動作用，就充分證明了一個真理：“人”——是具有無窮無盡力量的。在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基礎上，我們勞動人民以自己勤勞的雙手，在改變着我國經濟貧窮落后的面貌。“要干，要革命”，“苦戰三年，幸福萬年”，正是從心底里說出來的話，這種干劲，這種力量，已經具體表現在全國的大躍進、特別是工業生產的大躍進中。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所製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基本特點中，提出了“在集中領導、全面劃規、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业同時並舉”的方針，這就是動員全國人民辦工業的方針。

在這個正確的方針指導下，我省今年的工業和全國各地一樣直線發展，逐月上升，比去年同期增長是：一月份為9.6%，二月份為23.25%，三月份為26.23%，四月份為39.91%，五月份為63.6%，六月份預計為108%。就是這樣，幾個月時間，辦起了鄉、社工廠15萬間。就是這樣，鋼鐵、石油、拖拉機、汽車、高級合金鋼等等許許多多新產品，在人們面前出現了。有些人認為辦不到的事情辦到了。過去，誰能設想一間廣雅中學也能煉出鋼來呢？一間設備平常的修理工廠做出了拖拉機來呢？今天，這些都是確確實實的事實。就是這樣，任何困難，在覺醒了的勞動人民的沖天干劲面前，都冰銷雪化了。現在，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激動人心的口號，已經化成了偉大的物質力量 and 實際行動了。目前的景象是，不但工業部門在辦工業，非工業部門也在辦工業；不但中央和省在辦工業，專區和县、鄉、農業合作社也在辦工業。可以設想，不要多長的時間，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將到處矗立着冒煙的煙囪，到處響徹了機器的聲音，到處都裝設了電燈，生產大大躍進，生活相應改善。面對着這

種蓬蓬勃勃，轟轟烈烈的場面，面對着無可否認的巨大成就，“觀潮派”是輸定了的！

也許還有人念念不忘1956年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完全解除“反冒進”影響的束縛，那就看看馬鞍形怎樣教育了我們。

1956年的大躍進形勢，是在群眾性的肅反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之後，在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及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高潮的基礎上出現的。那時，群眾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黨中央提出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40條和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不斷反對領導落后於群眾、思想落后於形勢的右傾保守思想，強調加強領導，全面規劃。於是，出現了生產建設上的新高潮。這個高潮，對於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大躍進必然帶來新的問題。這是正常的現象。當時，主要的問題是原材料的生產趕不上基本建設發展的速度；人民購買力的普遍提高影響到消費資料供應的緊張；以及國家的支付增加而出現了現金投放和回籠的暫時的不平衡等等。因此產生了某些較全面的供不應求的緊張狀態。問題不在於產生矛盾，而在於如何處理矛盾。可惜的是，當時有些同志對於經濟建設的速度還存在迷信觀念，不太懂得運用辯證法來分析、研究和解決矛盾。於是，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產生了一股“反冒進”的逆流，把躍進看成冒進，把支流當作主流，右傾保守思想抬頭，強調穩妥的按部就班來建設，許多基本建設項目削減下來了，農業發展綱要40條也丟了，多快好省也不願提了，生產躍進的指標降低了。消極的因素一時占了上風。但是結果又怎樣呢？恰恰相反，1957年上半年出現的，並不是如右傾保守者們想象的一切按部就班，順順利利地發展的局面，而是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緊張局面：基本建設部門任務不足，大量窩工；工業訂貨減少，生產開工不足；勞動力過剩；學生升學和就業都感困難。於是問題就

来了，奋斗方向在那里呢？向何处去？当时在部分群众中确曾引起某些思想混乱。

但是，为时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扭转了这种情况，正确地指出了奋斗方向，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提出了“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号召，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于是全国人心振奋，斗争昂扬，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一个新的全面的更大的跃进高潮就掀起来了。

从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正确的领导思想和坚决地依靠群众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的事实说明1956年跃进形势中产生的问题，是完全可以促进的办法来解决的。首先，领导思想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从一个跃进引导到一个新的跃进。眼睛是向前看，不是向后瞧。应该充分相信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破除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存在的迷信观点，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红又专，政治挂帅，就能无往不胜。其次，社会需要的增长虽然会造成一时的紧张，但处理得好可以成为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力量。原材料生产不足，或者是其他生产资料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多办、多产。但是不能单靠大型工业，单靠中央的专业部门来办，而应该是大家办，全党办，全民办。“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型工业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有效的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方针。再次，消费资料不足的解决，一个是适当的增产，一个是积极的节约。中国人民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是勤劳勇敢的。我们受尽了一穷二白的苦头，迫切要求摆脱这种状态，尽快建成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央提出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号召，不是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吗？为了长期的幸福，广大劳动人民自觉地忍受着暂时的困难，以无比干劲进行苦战。这次的大跃进虽然主攻方面是生产资料，但消费资料并不感到不足，市场非常稳定，物价还稍有下降，商品库存量增加，就充分证明了消费资料不足的问题是可以妥善地得到解决的。最后，把全党全民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中央和地方的国家力量同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群众的个人力量结合起来，我们就有非常强大的建设投资力量。生产的迅速发展，也更多更快地增大投资的力量。今年跃进中的投资规模是十分巨大的，但现金收付的情况却非常良好。这说明把全党全民的资金潜力动员起来之后，投资愈大生产愈

多，生产愈多投资能力愈增大，这是互相促进的。

应该肯定，今年的工业生产大跃进，也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是不断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不断解决矛盾，不断前进？还是重复“反冒进”的老路呢？这就是促进派和促退派的分野。

还有一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贯彻“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型工业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表现某种程度的动摇，面对着工业生产跃进中存在的原材料、设备、资金、劳动力的一时的某些困难，就有着两种态度、两种做法、两种结果。一种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大步前进；一种是缩手缩脚，叫喊困难，伸手向上，小脚走路。这实质上反映了是否愿意坚决贯彻群众路线的分歧，反映了是否认识这三个并举的方针是全民办工业的方针的表现。当然，我们是拥护前者而反对后者的。前一种人思想解放，说干就干，积极发动群众集资、集料、集人，用土办法搞小型工厂，很快地就办起很多工厂来了，也办得好，办得省。后一种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有不少迷信思想，迷信大的，不相信小的，觉得小的不够过瘾；迷信“洋”办法，不相信土办法；迷信“洋博士”，不相信土专家。不相信群众，于是只好依赖上级，等待大的“洋”的，结果是走上少慢差费的道路。这种同志是不太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不太知道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小的可以变大，土的也可以变“洋”。无数的小工业合起来就成为不小的大工业。（当然建立一些大型或中型的骨干工厂也是必要的。）广东今年（主要是下半年）要生产40万吨钢，明年生产150万吨钢，看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这些钢，很重要的就是靠土办法多搞小型厂来生产。150万吨钢，就相当于一个包钢或武钢的规模了。但我们用土办法，搞小型厂，不要花很多的钱，不要用多长的时间，就搞起来了。办工业离开了几个“并举”，就谈不上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谈不上办工业的群众路线，谈不上多快好省。

也还有些同志对广东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有所怀疑。他们囿于某些所谓“权威”的论调，说什么广东缺煤，资源不足；说什么工业基础薄弱，说什么只适宜发展轻工业，不适宜发展重工业。这些论调，现在都已经彻头彻尾破产了。当然，广东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丰富的农副产品，制糖、原盐、丝绸、造纸、陶瓷、罐头以及不少轻工业，都需要发展。但是发展轻工业要机器，要燃料，要动力，要重工业，我们不能也不应全部向中央伸手，而且广东也是具备着发展重工业的优良条

件的。煤、鉄、石油、錫、鋅、鉛、錫、鉍、鉛銅等，不但有，而且資源豐富，如高要專區最近發現了儲量達十億噸以上的鉄礦和儲量達六千多萬噸的煤礦。興寧的一座大銅礦，初步勘查，蘊藏量即在一萬噸以上。韶關專區簡直遍地皆鉄礦。粵北的連陽煤田儲量達六億多噸。這些都只是最近初步勘查出來的重工業礦產資源。可以預料，今後還將有更多的發現。此外，還有十分豐富的大小水利動力資源。再說，廣東的工業基礎雖不太好，但比起其他各省來，也不算很差。何況基礎薄弱也可以變為好事。“窮則變，變則通”。基礎差就要變，就有力量。除了甘居落後，我們沒有理由不在廣東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共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提出要在三年內把廣州市建設成華南的工業基地，就正是實現要在廣東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要求的主要表現。這是符合毛主席關於“地方應

該想辦法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首先是協作區，然後是許多省，只要有條件，都應建立比較獨立的但是情況不同的工業體系”的指示的。

馬鞍形給我們的教育是極其生動，極其豐富的。現在廣東工業大躍進的形勢已經形成，但這僅僅是開始。只要我們堅決依靠群眾，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執行幾個“并舉”的方針，不斷克服各種各樣右傾保守思想，不斷破除形形色色的迷信觀點，解放思想，政治掛帥，把共產主義的紅旗插遍每個角落，把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車子開得更快、更猛，可以預計一個規模更大、速度更高、來勢更猛的工業生產高潮即將到來。實現廣東的工業化，建設一個既有輕工業，又有基本工業和原材料工業的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將是指日可待的。

1958年7月

廣州各高等學校師生 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

在整風運動和教學與科學研究改革運動取得勝利的基础上，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目前在廣州各個高等學校正在開始形成。華南師範學院的暑假留校師生，在8月底就在大辦工廠的同時，成立了1百多個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他們學習了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思想，批判了“苦戰太緊張”和“當教師難躍進”等錯誤思想。教育系二年級學生為了徹底改造舊的教學大綱，編寫兒童心理學教學大綱，就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認真學習毛主席的三大哲學著作，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和編寫教學大綱的方向和原則，進一步解決了思想，經過一個多月的苦戰，終於8月17日編寫出我國第一個兒童心理學教學大綱。師生們在提高政治覺悟後，迫切感到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必要，於是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便紛紛成立起來，

逐步形成學習熱潮。中山大學師生也紛紛成立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歷史系師生為了更有計劃地結合時事政策學習和結合資產階級史學批判，于8月中旬就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研究會”（由系黨總支書記王雨華和金應熙同志負責）、“時事政策研究會”（由鍾一均副教授負責）和“資產階級史學批判會”（由系主任楊榮國負責），而以“毛主席著作研究會”為主，三個研究會同時互相配合地進行活動，主要要求全系師生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武裝自己，以達到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立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覺悟和業務水平的目的。廣東師範學院以及其他各理工農醫等專業學院師生，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也正在積極醞釀和開展中。

（山）

生产大跃进中的互助协作问题

孙 孺

在当前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中，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竞赛。另一方面，也同时看到处处都有互相帮助的协作。在全国各个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集体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互助协作已成为普遍的自觉的行为。这是在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崭新的共产主义风格，是这个时代的新的精神面貌。例如，广东省番禺县与中山县毗邻的地区展开晚造水稻高额丰产竞赛中，番禺县窝头乡、灵山乡了解到竞赛对手的中山县黄阁乡、大岗乡有困难时，马上抽调了劳动力、耕牛、农具、播种器、拖拉机，组成支援队伍去支援。又如上海钢铁工业的二百多个单位，实行全面大协作，以四十七天的高速度基本建成了一座年产六十万吨钢的转炉车间。沈阳冶炼厂为了支援三家乡办工厂，将房子五间、车床两台、刨床、凿眼机、压力机各一台及许多零件送给三家乡，同时还支援了翻砂厂的全套设备，帮助解决了电源、电线。再如江西、湖北、安徽三省毗邻地区，最近订立了农业、工业、交通和财贸等各方面的协作制度。在兴修水利、造林、抗旱、防洪等工作中，更是普遍地出现几个乡甚至几个县的协作。雷州半岛一条长达百多里的青年运河，就是几个县几十个乡大协作的巨大工程。在省与省之间，早已成立了经济协作区，在分工协作、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制定了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个人之间更加多地出现了先进工作者和老师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发明创造和技术经验传授给别的工人，耐心地帮助别人赶上自己的水平。从这些数不清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人民所表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它将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和发展，将促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速完成。

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劳动活动是以简单的协作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出现第一次大分工以后，协作更是发展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社会分工愈细就愈要协作。但由于随之而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阶级的分化，产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剥削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小生产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各个地区、集团、生产部门之间，虽然也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互助协作。尤其是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形成了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但是因为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生产成果为私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和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这就形成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社会化所要求的协作和私人占有形式所产生的互相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成为不可解决的矛盾。在这种社会里，只有利害的结合，互相倾轧，你虞我诈；有的只是大企业并吞小企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剥削经济落后的地区，城市剥削农村。它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是：“一切都为了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天经地义的哲学，“损人利己”成了合法的道德，根本没有可能实行互助协作。就是在还缺乏阶级觉悟的劳动阶级之间，他们为了避免失业的威胁，为了生存，就必然要将自己的本领、技术、经验留一手，不愿轻易传授他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在那样的社会里，生产力受了层层束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社会里，阶级的对立消灭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消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都属于全民所

有和集体所有。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因而，最充分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每个地区、每个生产部门、每个人，虽然分工不同，工作岗位不同，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目的是共同的。这正是反映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发生作用。为了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这个目的，就要求把所有的生产部门联合成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①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要求在各个经济区之间、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密切的分工和协作，实行在统一计划下统筹安排，迅速地发展生产。同时，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已经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同志式的为了共同目的而进行生产的友爱关系。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助协作关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必需，而且也有了它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真正的互助协作，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这种协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分工和协作。它不同于原始社会的简单协作，因为它是在高度发展的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精细分工，要求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不断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实行的互助协作。同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是在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地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负有高度责任感，并将它放在个人和本单位、本地区的局部利益之上，因而采取了互助关怀，互助帮助，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志态度。这种思想和态度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

二

我国在1956年经过三大改造高潮之后，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要求下，目前全国人民，正在积极地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规定了自己的宏伟的中心任务：“在工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和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现代化

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机械化；实现全国城乡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城市、省、自治区，以至大部分的专区和县都实现工业化；使全国县城和很多乡镇都有自己的工业；建立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运输网和邮电网；并且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事业”。^②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之下，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盲目的各自发展，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象一部组织完密的有节奏的大机器，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它一方面要求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各个企业根据本身的条件，在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挖掘生产潜力，自力更生，土洋结合，既要发展农业又要大办工业；另一方面又要求各地区、各个生产部门、各个企业之间实行互相援助，分工协作。不这样就不可多快好省地、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就不能和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规律相适应。

目前，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一只手抓农业，一只手抓工业，两只手一齐动。既要搞农业丰产，在一两年内基本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又要以钢为纲，掀起“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运动。为要全面搞好工作，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除了大力发动群众，发挥潜力，组织生产，自力更生解决自身的需要之外，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互助协作也成为急切的要求。目前要求互助协作的较主要的内容，大致有下列几方面：

（一）在经济协作区内，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资源分布不同，因过去工业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技术水平的差异，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共同发展，就要求实行全面的互助协作。协作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共同制订统一的全区的（指经济协作区）发展国民经济的较长期的全面计划。根据资源的分布，技术设备的水平，采取互通有无，互补短长的办法实行分工协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尤其是较大规模的重工业，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土地。

^①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文选”两卷集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348页。

^②人民日报8月6日社论“互助协作——共产主义的风格”。

(二) 城鎮与乡村之間，大城市与各县之間，目前由于县县、乡乡办工业，对工业設備和生产資料的需求迅速增加，就要求城鎮对乡村，大城市对各县提供工业設備、生产資料和技术的援助。另一方面，也要求乡村服从全省计划的安排，对城市工业提供原料。同时，对工业发展的重点，也应作统筹规划，实行合理的分工。譬如广东省委最近召开的鋼鐵生产紧急会议，考虑到煉鋼的技术更复杂些，决定專区和县，特别是县，主要的任务是鑄鉄，煉鋼的任务主要依靠广州市完成，各專区、县必須把煉出的鉄供应广州完成煉鋼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經济。同时，大城市还要更多地生产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供应农村中日益增長的需求，而农村则要同时保証对大城市供应粮食、付食品及工业原料。

(三) 工业基础较强的大城市与工业基础较弱的地区，則要求前者对后者提供机器設備和技术力量的援助，大力帮助新工业地区的成長，同时又要求后者对前者保証工业原料、生活資料的供应。上海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就是共产主义协作之风的一个范例。

(四) 在地区同一的或城市中，企业与企业之間，也同样要求根据各个企业的条件实行分工，技术基础較好的企业应协助技术基础較差的企业。为了完成全区性的重大任务，也要求各个企业实行大协作，共同保証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

(五) 乡村与乡村之間，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間，也要求在技术經驗、劳动力方面彼此援助和协作。同时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要求下，有許多工程如大型水利、发电站……等，更要求社与社、乡与乡甚至县与县、省与省之間实行大协作才有可能完成。当前在全国各省普遍出現的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使工农商学兵合一，乡政合一，这一嶄新的社会基层組織的形式，也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一个新的形式。

(六) 在中央与地方、省与專区、县之間，由于許多企业的管理权已下放，各地积极发展地方工业的时候，就要求遵照地方服从中央、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把局部利益放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下，首先保証国家计划或省的计划（对專区与县而言）的完成，按照计划完成各項調拨任务。离开了这一点就是离开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当然中央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的原则下也必然照顧到地方，同样省也必然照顧到專区和县。这样的上下之間的协作，是保証我国社会主义早日建成的一个重要条

件。

实行上述各方面的互相协作，是多快好省地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任务的客观要求和有力的保証。

三

一年多来的全民整风运动，我国劳动人民在思想战綫上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崇高思想已深入人心，对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的利益給予莫大的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感。大公无私的无产階級思想压倒了自私自利的資产階級思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代替了資本主义的本位主义思想；关怀帮助别人的思想排挤了損人利己的思想。正是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扬，改变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当前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中，到处出現互相协作的思想基础。

但是，是不是在具体实行互相协作的时候，就已經不会碰到困难，不会出现某些不协调的现象呢？当然不是的。如果这样想，我們就不是辯証唯物主义者了。这是因为各地区、各部門、各單位、各个人都負担着不同的任务，对自己所負担的任务的完成与否，負着直接的责任，如果它同时又承担了援助别人的任务、和别人协作的任务，这样就会产生矛盾。各个地区之間，出現某些生产資料或生活資料供应不平衡时，貨源地区就产生滿足本区和支援別区之間的問題。各个地区之間的分工，也会存在你发展什么，我发展什么的問題，你发展了会不会影响我的发展的矛盾，諸如此类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問題是用什么立场、态度来解决这个矛盾，解决得好，不协调的现象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解决得不好，就会加深不协调的现象，使工作受到損失。目前到处出現的互助协作的許多事例，都說明了絕大多数的地区、部門、單位、个人都是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以整体的利益为最高的标志，以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类的問題。上海工厂在支援兄弟省、区的态度和做法，做出了范例，番禺、中山毗鄰地区的农业社也做出了范例。

然而，也应当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是一条主流，而共产主义思想的觉悟程度，在各个地区、各部門，各單位、各个人之間是不平衡的。在当前的形势下，公开反对协作的人当然不会有或者是极为少数了。而在实际工作中，多看到本地

区、本部門、本單位或本人的困难和重要性，少看到別人的困难和重要；先完成本身的任務，再考慮別人的任務；多顧局部的利益，少顧整體的利益；多要求別人幫助自己，而自己則少幫助別人…等現象仍然在個別地區、部門、單位、個人中存在。譬如，對一些供應較緊張的原、材料，某些貨源地區不是採取積極發展生產辦法，顧全大局的態度，而是消極地採取封鎖的辦法；某些工廠為了自己發展生產，不惜用高工資來招引別家工廠的工人；某些地區原來是為別個地區的工廠供應原料的，在發展工業時就只想到停止對別區的原料供應留來自己辦工業，而不是統籌兼顧，既要為本區的工業生產原料，也要保證對別區的供應，不然，自己的工廠建起來了，別的工廠卻因為沒有原料供應而停止生產或減少生產，從整體的利益來看是沒有好處的、浪費的；某些地區在執行國家規定的調撥計劃時附加了一定的條件，要調入地區用某些物資來交換，否則就不執行調撥計劃或執行時打折扣。這些雖然是個別現象，但與共產主義的互助協作精神是相違背的，和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是不相適

應的。因此，繼續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繼續拔掉資本主義和本位主義的白旗，插上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紅旗，仍是一個嚴重的任務。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所說：“一切違反協作的精神都是與共產主義風格和作風不相容的，必須堅決地徹底地加以克服。東風不壓倒西風，西風便壓倒東風。任何陣地，共產主義思想不去占領，本位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便會乘虛而入，並且會刮起歪風，阻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前進。”除了進行這樣的建設之外，各地區、部門、單位之間，凡是共同負擔了協作任務的，都要以協議和合同的形式將它固定下來，而且必須以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合同和協議。同時，還應當將協作的任務列入自己的計劃內，作為整個計劃指標的一部分來保證完成，發揚社會主義的互助協作關係。互助協作關係的發展將使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更臻完善，更能適應不斷向前發展的生力力的要求，使社會生產力進一步得到解放，飛躍地向前發展。

1958年8月30日

中山大學掀起群眾性的科學研究熱潮

中山大學掀起了群眾性的科學研究熱潮，爭取在今年國慶節做出成績，向黨獻禮。

文科各系老師們發揮了沖天干劲，提出了近四個百研究項目，其中歷史系近百項，形式多種多樣，有論文專著、書評、翻譯和教材的編寫等。這些研究工作都是結合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和結合實際進行的。青年教師們集體合作批判劉節的中國史學史講義；有些進行海南現代革命史料的整理調查工作；有些則編寫中大學生運動史和撰寫西亞民族解放運動史等等。西語系教師提出的研究項目共二百多項，以教材建設為主，編寫漢英、漢法、和漢德新詞典。這些詞典特以中文詞匯為主，緊密結合政

治，結合生產，克服舊詞典缺乏新詞匯的缺點。中文系教師提出一百一十項論文和創作文章，他們在到新會高明等地參觀中收集了不少材料，有些已寫成文章。政治課教師聯繫實際，結合教學，結合工作，準備寫出一百篇論文，題目有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問題，以及一年來整風運動中社會主義教育經驗等等。

這次群眾性科學研究的開展，是在黨委的領導和號召下，在教學改革和科學研究改革之後進行的，是一年來整風運動使人們的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和集體協作的共產主義風格的成長的表現。

（珍）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詭辯术

章 沛

以南共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革命新形势下，帝国主义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反动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鼓励下，透过南共的反动纲领，发出了有完整系统的、但荒谬绝伦的梦呓。

他們的七顛八倒的鬼話，如果“直言不諱”，是无论如何騙不了人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了解这一点。因此，在南共纲领和一些南共领导集团人物的談話中，表述就不那样“坦白”，而总是轉灣抹角、挖空心思地加伪装、打掩护、耍无賴，企图顛倒黑白、混淆視听。一句話，就是运用了彻头彻尾的詭辯术。

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也是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同思想方法。这种詭辯术的特質是：主观任意地玩弄概念，不联系实际；只看表面，不看本質；只看片面，不看全面；并且为了掩盖自己的理論实質，而进行伪装。

必須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詭辯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应该把这些思想毒菌拿到太阳光下，拿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唯物辯証法的电子显微镜下，拿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洪爐中去，讓它原形毕露。

现代修正主义的詭辯，首先是用混淆本質差别的手段，来达到否定矛盾，否定对立的目的。

唯物辯証法認為：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对立双方，就其本質差别來說，具有明确的界綫，絕不因为它们之間的统一及互相轉化性而有所湮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命題之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說，正是这一理論原則的具体运用。

然而，现代修正主义不承認这一个革命的理論原則，他們抹杀对立面双方的本質差别性，仿佛对立面的斗争不是绝对的，而对立面的统一才是绝对

的。这一詭辯方法，正正表现在现代修正主义对待阶级斗争，特别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問題上。

修正主义者在承認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实行割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理論核心，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学說。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运用了唯物辯証法，論証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專政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社会。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及社会革命之必不可避免。为了要使得资本主义能够苟延残喘，修正主义者就不能不运用詭辯，来歪曲这个革命的理論，列宁曾經指斥过考茨基分子的詭辯方法，揭露他們为了迎合资产阶级而抹杀阶级斗争中的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现代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

作为帝国主义的仆从之一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比起他們的老祖宗来却走得更远一些。他們从修正主义的取消阶级斗争的观点，进一步“論証”了国际阶级斗争的問題和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問題。

他們使用着同样的詭辯方法，抹杀在两种制度、两大陣营、两条道路中的阶级本質的差别性。仿佛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革命的道路与改良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等等的区分及斗争，都是庸人自扰的，多余的。他們企图通过这些詭辯，来延長帝国主义的寿命。

现代修正主义之所以把矛头集中于这些問題，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在世界范围获得空前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設成就鼓舞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鼓舞和支持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因而愈益动摇了世界帝国主义的經濟的、政治的根基，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担当起保卫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任务，就有必要在这些問題上，大做其修正主义的文章。

现代修正主义表面上似乎承認资本主义制度和

社会主义制度，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别。但在几个“花枪”之后，就把它们混在一起。

现代修正主义者歪曲和伪造事实。他们硬说垄断资本主义中，有“计划因素”（其实是全国性的垄断统治）；然后又制造出一个“超阶级”的“国家”，在实行“国家所有制”，成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是“资本主义保存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可以“同时是前者又是后者”。为什么呢？据现代修正主义的解释，因为“计划因素”，“国家”对私人资本的监督、限制、“剥夺”（即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大垄断资本通过自己的国家机器进行垄断），正在“突破”资本主义的“孔隙”。就其“客观趋向”来说，是“不可阻挡地深深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然后，对社会主义制度，却尽情加以污蔑和丑化。现代修正主义表面上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可是跟着就指出了这个“公有制”的“发展前途”。照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如果“国家所有制”继续保持下去，“国家”就会在行使经济职能时，使“经济丧失其内部动力”并且使“国家”和“党”成为一个“超社会的力量”，产生“官僚国家主义”，力图保持“国家资本主义”（注意：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成了“力图保持国家资本主义”），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现代修正主义的“神奇”的诡辩术，获得了恶毒的结果。试把上述两个诡辩结构拿来对照一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样的有一个“超阶级”“超社会”的“国家”，在实行“国家所有制”，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动物中的鸭嘴兽一样有“两面性”；它既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靠了这个虚假的逻辑中介，现代修正主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资本主义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二）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也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三）私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如果用公式替现代修正主义把全部的谬论直截了当地表达一下，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这个结论对现代修正主义来说，用处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举而取消了矛盾和对立，取消了对立面的本质差别，取消了两种制度、两大阵营、两条道路的敌我界线。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里玩弄概念。在他们的思想上，概念是可以抽空客观内容而任意搬用的。他们既可以把资本主义叫做“社会主义第一步”，也可以把全民所有制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他们高兴，也可以把本来是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变做抽象概念，推到云端，成为“超阶级”“超社会”的东西，然后把“财产”全部交给它，来代替具体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样来躲开“共产主义的魔影”，躲开“阶级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意图是恶毒的。他们通过抽象概念的摆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虚伪的共通本质的桥梁，目的就在于“证明”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并无对立，并无本质差别。然而，却并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而是要引导别人通过他们所摆设的中介，自动地得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共通”的结论。他们既散播了毒菌，还要别人自行中毒，逃避责任。

现代修正主义之所以敢于玩弄概念及逻辑把戏，是因为他们以为：抓住一些表面相似的东西，就可以迷惑别人。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垄断资本主义在全国的经济统治拿来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集团的长远和全体利益的某些偶然限制，当成社会主义，当成国家“超阶级”的证据。他们甚至认为象英国工党所搞的钢铁业国有之类，是“剥夺”私人资本，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正是故意从表面的相似而抹杀本质差别的表现。至于钢铁业国有是排除了资本家还是供养了资本家，是损害了资本家还是让国家来负担资本家的亏损，是取消了资本家的统治还是加强了资本家的统治。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是无足轻重的。正是在这里，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另一惯用的诡辩方法：只谈表面，不谈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诡辩术，还表现在依据毫无事实根据的伪结论而引导出一系列隐蔽的“逻辑”推论。从混淆本质差别开始，在一切对立的社會现象中全部取消了阶级斗争的烙印。现代修正主义者正是这样来进行他们的推论“十字军”，以拯救他们的帝国主义“圣地”。

既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共通的，那末，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划分就毫无“意义”了。这不是什么两大阵营，而只是“两个敌对的军事集团”。既然这样，它们就应对紧张的国际局势“共同负责”。既然帝国主义正在变成社会主义，而偏偏社会主义国家又不肯和他们合作，斯大林又执行了“顽固”的外交政策，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就应

負“更多的責任”，在目前的東中問題上，既然墨菲是“和平使者”，中蘇會談公報就只能“加劇”緊張局勢。既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差不多，不同社會制度就“不應成為產生集團機構的必然性”。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以達到“世界經濟的統一”。而“世界經濟的統一”則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因此……意思是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世界社會主義”就可達到了。——從此阿彌陀佛，天下太平。

現代修正主義在隱蔽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反動公式上的一系列推論，是詭辯術的典型表現。因為詭辯方法，正是最善於依據毫無客觀根據的假設而大發議論的。這些議論，看起來冠冕堂皇，却經不起分析。只要檢驗一下它的議論的客觀根據，檢驗一下發議論者的屁股坐在那里，就會使得這些議論象沙灘上的寶塔遇到台風一樣，全部塌台，並且埋葬了自己。

所以，即使現代修正主義者故意不提帝國主義的本質，迴避帝國主義和剝削、和奴役殖民地、和戰爭的內在聯繫，裝出“中立”、“超集團”的樣子而大發謬論，自以為真的是站在雲端上，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穿，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屁股，正正是坐在美元堆上。

現代修正主義的詭辯術，還表現在根本否定唯物辯證法的“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及“發展是從量變到質的飛躍”的革命原理。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及建成社會主義的兩條道路上，同樣玩弄了取消對立，顛倒黑白的伎倆，把革命的發展觀變成了庸俗的進化論，而且還加上兩個法寶，叫做“多樣性”和“民族特殊性”。

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在“這種客觀條件”下，可以是革命的；在“那種客觀條件”下，又可以“妥協的、滿足於改良”。為什麼“改良”不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呢？資本主義不是已被“證明”日益走向社會主義了么？

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形式也應該是“多樣”的，而且還要考慮“民族特殊性”。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有時要和小私有者”等等“妥協”一下。社會主義不應該採取全民所有制（現代修正主義者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應該是“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小私有者的土地所有制應該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什麼“公有制”不可以和“私有制”和平共處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早就被“證明”有共通的

本質嗎？如此這般，建成社會主義就無所謂兩條道路的鬥爭了，過渡時期也沒有敵我矛盾而只有人民、內部矛盾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意味著鎮壓敵人而只是意味著“領導”了，國家機器也不是暴力鎮壓敵人的工具而只是“調整內部矛盾和對立的工具”了。國家應該馬上“消亡”下去，否則就會變成“國家極權主義”。黨呢？不應該在政權方面起作用，而應該在“形成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方面起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應該吸收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關於個人權利的積極的、持久的因素”，“個人幸福”不能服從於“任何最高目的”。

以上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及建成社會主義道路的形式多樣性的借口下，南共領導集團根據“民族特殊性”所設計的“社會主義”。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教條主義”、“思想壟斷”、“政治壟斷”。

很明顯，現代修正主義在這裡玩弄着用多樣性來代替矛盾，用片面來代替全面的鬼把戲。

事物誠然是多樣的，但在多樣性中，唯物辯證法教導人們要抓事物中的矛盾，在多樣的矛盾中要抓主要矛盾；因為矛盾、主要矛盾正是事物之本質的具體表現。但是，現代修正主義把矛盾溶解在多樣性之中。這樣，革命與改良，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就不再是矛盾着、對立着的事物，而只是多樣性的一種，彼此在和平共處着。取消了矛盾和對立，唯物辯證法的革命的發展觀就被“修正”為庸俗的進化論。

事物誠然具有特殊性，然而，事物的特殊性中有普遍性；普遍性不是離開特殊事物而存在，而是從特殊事物中概括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不反對、不否認革命的多种形式，建成社會主義道路的多种形式，但從來都這樣認為，在這些多种形式之中，有着共同的普遍的東西。現代修正主義卻把特殊與普遍的辯證統一看成了絕對對立，用片面來代替全面，用特殊來否定普遍。詭辯的意圖是明顯的，目的在於以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來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路線相對抗，企圖通過這種詭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否定在蘇聯行之完全有效的建成社會主義的普遍經驗，以進行其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勾當。

現代修正主義的另一偽裝是：反對教條主義、思想壟斷、政治壟斷。可是他們所指的“教條主義”不是別的，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和修正主義所不喜歡的一切東西。至於所謂“思想壟斷”、“政治壟斷”則是現代修正主義挖空心思地編造出

来的对思想一致、政治一致、行动一致的恶毒詆蔑。因为这种一致，既不符合现代修正主义的“多样性”和“民族特殊性”，又不符合于“资产阶级民主”中那些“关于个人权利的积极的和持久的因素”，更不符合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个人幸福”，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个人幸福”是“美元”，而且也“不服从任何”例如社会主义之类的“最高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还学会了“贼喊捉贼”的伎俩。

广州哲学学会成立并开展活动

以組織和开展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主席著作，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及广东地区实际工作中有关哲学問題的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广州哲学学会，已于八月十六日在广州成立了。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長王匡同志应邀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問題”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委会副主任杜国庠同志在会上号召全省人民打破对哲学的迷信思想，大家都来学哲学、用哲学，讓哲学在全省范围内遍地开花。

成立大会通过了“广州哲学学会会章”，討論了1958年下半年的工作规划，強調开展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調查、收集、整理和汇编有关哲学的資料工作，与全国各地及本省各地区哲学工作者組織建立联系。

大会选出杜国庠、杨康华、陈唯实、陈越平、黄莊平、王致远、刘渠、史丹、吳楓、龙世雄、张进、杨友吾、譚耀年、戈楓、李超、张江明、杨荣国、杨庆（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小組長）、杨樾等一十九人为理事，另保留二名理事名額，以补选工农哲学工作者。并推选杜国庠为会長，陈唯实、陈越平、戈楓为副会長。

广州哲学学会是在工农学哲学的热潮中成立的。在二十七日举行的第一次理事會議上，研究了当前全党全民理論学习的形势，决定全体理事配合当前理論学习运动，分头搞試点，并号召全体会員，满腔热誠地到劳动群众中去，首先向群众学习，在当好学生的基础上，輔導工农学哲学，在和工农群众一起学哲学中，繼續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改造自己的学习方法。

九月七日上午，广州哲学学会又举行了哲学工作者座談会，討論目前工农学哲学的发展情况和如

据說，他們也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国家和党的理論进行“实用主义的修正”。然而，他們的所謂“修正”，正是指的加强无产阶级專政，加强党的領導。现代修正主义和我們之間是找不到共同的語言的。这是因为我們遵循的是革命的唯物辯証法，而以南共領導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运用的却是他們的老祖宗遺传下来并早已破产了的詭辯术。

何組織專業哲学工作者到工厂，到人民公社，到街坊居民中去的問題。

座談会首先由广州市南区宣传部曹平凡同志介紹了該区組織工人学哲学和普遍开展以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理論学习的經驗，并会报了該区的學習情况。目前該区除在工厂、街道及手工业合作社已組織了学习小組外，并将有系統地举办短期輔導員訓練班。接着由广州市北区宣传部陈月华同志会报了該区的學習情况，提出如何进一步普遍开展这一学习，如何繼續提高等問題。

广东中級党校副教育長张江明同志会报了党校教学工作人員如何和工厂、人民公社建立联系的經驗。提出了如何联系实际克服教条主义的几点意見，接着，华南师范学院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王致远、中山大学刘嶸、暨南大学陈小尘等相繼发言，一致認為各該院校的师生对于到工农群众中去的熱情很高，普遍要求和工农一起在学习中提高自己。

广州哲学学会会長杜国庠同志在会上听了各方面的情况介紹后，就如何普遍开展这一学习，如何进行輔導，如何繼續提高等問題，作了精辟的发言。他強調要抓紧時間，特別要注意边学边用，联系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問題。他說：“广州中一烟厂的工人喜欢讀矛盾論、实践論，就是因为这两大著作提出了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普遍真理；他們一經掌握这些普遍真理，就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許多問題”。他要求大家注意認真克服書呆子习气，从实际出发。并說：“預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广东，哲学的广州”。

最后，到会代表就普及和提高、发展輔導力量、輔導力量如何平衡、輔導方法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道論

怎样正确理解陈白沙的哲学思想

黃之流

今年二月間在第二期“理論与实践”杂志上看到章沛同志的“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一文，觉得还有相当道理。他認為陈白沙的“道”是物質而又是运动性的东西；陈白沙用靜坐的办法去“得道”，也是一种具体的涵养功夫，这不但把陈白沙說成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論者，而且簡直象是一个辯証的唯物論者。自然，在我們中国多有几个唯物論者，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我把陈白沙全集仔細研究一番，又把章沛同志的文章精讀几遍，觉得章沛同志那篇文章未免牵强附会，还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

章沛同志提出白沙的“道”有实体、本体、总体、总称的意义，論据是：“道为天下之本”，“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道至大”，“无内外”，“无一处不到”，“无不是这个无塞”等等，于是論断“道”是“一般者”，有如物体中的物質一样，存在于气象万殊的物体中，当然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这样理解“道”这一范畴的，不是章沛同志的創见，苏联的杨兴順和中国的任繼愈，都这样解释老子的“道”，但曾經引起过爭論（这里且按下不表）。我觉得章沛同志把陈白沙的“道”也这样去理解，却是錯誤的。

我們知道：物質性的东西，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識并且为人的意識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东西。但陈白沙的“道”的性質却不是这样。白沙說：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視道，則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以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

子得之”（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坐視金玉上）。

大，是从体积上来說的。天地間虽有万事万物，但万事万物还是存在天地中間，即使如章沛同志的辯护者聞峻同志所說，天地只是單一的两件东西，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到底是被天地所包罗的。举天地之大說，應該是包括万事万物在內的。比如說人大，当然是連人身上的寄生物也包罗在內。因为这是在量大小，而不是称体重。小的东西包含在大的东西中，量出了大东西的体积，事实上連小的东西也量之在內了。万事万物既然包括在天地中，那末，从积体上来說，道比天地大，道又寄存在什么地方？道比天地还大，当然存在天地之外，这說明了白沙的道根本不是个客观存在的物質性的东西。而且白沙明明說过“君子得之”，如果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实体、总体、总称”，为什么君子能得之呢？这个君子真是道法无边，比小說中弥勒佛的道法还要大。如果說这个“得”字是当“認識”解，那末，且看看白沙認識这个“道”后，会发生怎样大的神力。白沙說：

“君子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无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举天地間物既归之于我，而不足以增損于我矣。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禹舜之有天下而不与，烈风迅雷而弗迷，尙何銖軒冕坐金玉之足言哉。”（同上引）

“故得之者，天地与順，日月与明，鬼神与福，万民与誠，百世与名，而无一物干于其間，烏乎大哉”（与林时渠書）。

“苟有得馬，則能以四大形骸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杀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心戚戚哉。”（与僧文定）

得道君子能够不随天地增損，举天地万物不足以增損于君子，而且鬼神与福，万民与誠，这个君子真是神通广大。如果說一个人認識了一般的物質以后，就有这样超自然的神通，我們要問：这种超自然的神力是从那里来的？这个“一般者”能发出这么大的超自然的神力嗎？这是我所不解的第一点。

章沛同志还說白沙的道是运动性的东西，他的理由是白沙說过“无一息不运”这句话。我觉得从这一句话得出了这样的結論未免太輕率了一些。原因是在章沛同志的那篇文章中就引过白沙另一段与此意义相反的話，那段話是这样的：

“夫道无动静也，得之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欲静即非静矣……”

原来白沙說的道是无动静的，是“至无而动”的。所謂“无一息不运”，指的是“理”，可是章沛同志硬說白沙的“理”是称“道”的同义語。如果照章沛所說，这就与“道无动静”一語矛盾起来了。同一个东西，有时說它“无一息不运”，有时說它“无动静”，白沙不是自相矛盾嗎？

即使白沙自相矛盾，在章沛同志來說，就不應該得出这样的結論。即使白沙說过千百句“无一息不运”同类的話，章沛同志也不能抹煞白沙說的“道无动静”这一句话。据我看，白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章沛同志把白沙的“道”理解錯了，（我的解釋留待下文再說）。也許章沛同志还要哓哓爭辯，找許多理由，証明白沙的話怎样怎样，但章沛同志一定得設法否定“道无动静”这一句话，否則就不能証明“道”是运动性的东西这个論断的正确（但問題又来了，要是章沛同志否定“道无动静”这一句话，他就不應該輕率的引用）。这是我所不解的第二点。

章沛同志还說白沙的“道”，对形式來說，具有質料的意义；对現象來說，具有本質的意义，由特殊認識一般，需要由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但白沙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的。白沙說：“此理之妙不容言”（論前輩銖視軒冕坐視金玉下），“比試

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道不可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有目者不得見也”（同上）。又說：“非見聞所及”，（送李世卿还嘉魚序）”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謂道矣”（同上）。白沙的原意是：道是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狀，不可物的东西，不是章沛同志所說的質料，本質。难道質料和本質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狀，不可物嗎？物質的世界是我們不能感覺得嗎？即使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原子，不能以肉眼看到，为什么又不可言？难道說出了它是原子，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嗎？”毛主席在“实践論”有一句名言說：

“如果以为理性認識可以不从感性認識得来，他就是个唯心論者”，又說：“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則理性的东西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依此，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狀，不可物的东西，又何来感性認識。”章沛同志說可以“按”而知道，但“按”只是一种“类推法”，有唯物論的“类推”，也有唯心論的“类推”。由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狀，不可物甚至“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謂道”的“道”，即使能类推出来，也是一个虛无飄渺的东西。試問类推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言嗎？言之会失掉了它的本質屬性的存在嗎？”而且白沙說“道”是“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的东西，如果照章沛同志所解釋的有質料、本質意义，那末，这應該和天地人不可分离地存在着的，为什么天要得到它才为天，地要得到它才为地，人要得到它才为人呢？这是我不解的第三点。

由于章沛同志对“道”这一范畴理解錯了，因此有些地方不免証据薄弱，存有强辯。如他提出白沙的“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处也”这句话就論断心和道是两件事，这就是一种强辯。因为理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東西。比如白沙的“仁术論”中說的“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測，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我們唯物論者，就不会承認功业是一心之所致。但白沙当时說这些話，也許心安理得的，認為吾心与此理有凑泊处的。难道說白沙的这个理与他的心原是客观存在的两回事嗎？章沛同志又說白沙的“心乎此其一元之所舍乎”，的“一元”，仍然是客观存在而且与心是两件东西，这也是一种强辯。如果是那样，我們能否說“白沙乎，此其仁术論之理所舍乎”？就証明这是两件东西，因而把“仁术論”中的“理”，說成是物質性的客观存在的東西呢？象

这的論断，只要把章沛同志的文章所引用的話多加思考，就可看出章沛同志的破綻，本文因篇幅关系，暫說到这里为止。

下面我想談談我对白沙哲学思想的想法。

我認为把“道”这一范畴做为白沙的本体論，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看法。白沙明明說过道由“君子得之”，“心得而存之”。（见前引述）那末君子用心“得道”又“存道”，这說明“心”比“道”更具有根本意义。这一点，在“論前輩銖視軒冕坐視金玉中”，白沙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他說：“然无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辯，非道也”沒有君子之心即使辯道之輕重，也是徒然多此一举，可见要了解白沙的“道”，必須先了解“心”。

这个“心”，是一个怎样的心呢？請看白沙在“禽兽說”中怎样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貴，渾是一包浓血，裹一大块骨头，飢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权势，忿而爭，忧而悲，穷則盜，乐則淫，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則命之曰禽兽可也”

白沙虽然承認“心”生在“身”上，但他并不重視这个血肉之身。他認为人的身体虽然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但体现这个身体的存在作用的却是这个“心”。如果除开心去求身体的存在，身体只是徒具形骸，而且是个无用的形骸，与禽兽无异。就身与心的关系來說，心是主，身是末。在“与伍光宇”一書里，白沙更直截地說明了这一点，他說：“心寓于形而为主”。这个心寄寓在人的身体上而为身体的主宰。仅这一句話即否定了物質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否定了人对社会存在的依賴关系。在“望云图詩序”里，白沙更进一步說明了他的“心学”观点，他說：

“苟无其心，有文章足以收誉于众口，有功业足以榮耀于一时；有名节足以惊动乎流俗，皆伪而已，岂能久而不变哉”。

这就是說文章功业气节都是假的，只有心所发出的作用才是伟大的，真实无伪的，不为岁月所磨的。在这里，他又否認了人的主观行动对于社会行动的关系，而把“心”解釋成为神明莫测的抽象的东西了。

說到这里，我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結論：

一、白沙哲学中的“心”，是脱离人的肉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而独立的，它是个久而不变的抽象的东西。

二、人的存在及文章、功业、气节都与客观环境无关，一切都决定于心的活动。

也許有人要說：白沙所說的心只是生理器官，並沒有否定身的存在和岁月的存在。但問題不在于他是否承認身与岁月之有无存在。佛教的禅宗教义是大家公認唯心論的，但六祖“坛經”还有“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如来也說肉体是煩惱的根源，又說“以身布施”（金剛經）並沒有否定身和肉体的存在。嶺南的真空和尚也說过“成則便成，何必他日”（惠州西湖志），佛家也沒有否認世界。問題是在白沙的哲学思想上，心的地位怎样，是心决定客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决定心，心是居于第一性还是第二性的。

在肇庆府城隍庙記里，白沙这样說：

“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嗚呼孰能信斯言之不誣哉。”

这不明明是意識决定存在嗎？在“白沙詩教上”里，也有与此类似的話。白沙的詩句說：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人之心能决定天地之心，这个心的作用，真大矣哉，吾无以名之也。但不只如此，在“示兒”一詩里，他更露骨地說：

“若个人心即是天”。

他把心的作用提得这样高，簡直就是陆象山所說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翻版，这难道是主管循环作用的肉体的心嗎？

正因为白沙哲学中第一性的东西是“心”，所以，白沙在認識論上專从心上用功夫。在“書漫笔后”里，他說明了为什么要在心上用功夫的道理，他說：“君子之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

世上的万事万理，都能在心上求得，不必向外探索。在“与林緝熙”書里，他又說：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

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

这就是说，心上有理，而理能干涉万事万物。只要把心上的功夫做好了，就能够“希圣亦圣，希贤亦贤，希天亦天”（古蒙州学记），就能够由内到外的发出伟大的作用。心是终日运行不息的，也是细入毫发无一处想不到的，于是理也无一息不运，无一处不到了。但要收拾此理，归根结蒂，还是要在心上用功夫（即所谓“终日乾乾”）。

怎样在心上用功夫呢？白沙的办法，还是不借助于外界，而是靠个人去静坐。

在取得静坐这种秘诀上，白沙认为他是走过弯路，经过磨练才得来的。他27岁从吴聘君求学，对于古圣贤的书籍，古圣贤的训诫，无所不读，但没有成功，后来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没有朋友的帮助，只在书籍中去寻求，这样又经过了相当久的时间，亦未成功，再后来，他就“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事静坐，久之然后见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若马之御銜勒；体认物理，稽诸圣训，若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复赵提学愈宪）。

白沙的这种静坐办法，可能是接受禅宗的影响而得来的。白沙虽说过“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这样的话，但朱熹主静还主敬，甚至少说静，只说敬，要人“动容貌，整思虑”（学的），还多少留意外界的反映。白沙则不然。他的静坐，只是要人什么事情也不去做，专门闭户静坐。所以，他在与罗一峰一书中说：“若平生忙者，此尤为对症之药”。

静坐，只是要人莫忙于外事，专在心上用功夫。说穿了，就是和尚坐禅那种办法，由“住分”到“心一体性”，以求“止”求“定”达到“寂寂”的境界；由“明分”到“观照”，以求“观”求“慧”，达到“惺惺”的境界。白沙也是以静坐为手段，所谓“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与贺克恭黄门）。关于静坐是怎样的一个情形，白沙在“复赵提学”一书中这样说：“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似禅定”。

就是白沙自己，也不否认他的心上功夫接近于禅。据我们看来，白沙的静坐，和佛氏有区别的，只是白沙没有出家做和尚，还要有父子兄弟夫妻等人伦，还要混在俗人中间生活，所谓“不离乎人伦日用”，应作这样解释。

白沙静坐为什么不出家做和尚，道理在于：白沙的根本思想还没有脱离仟家的窠臼，他教人在心上用功夫，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又须把佛家所了解的心和白沙所了解的心，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原来佛所说的心是平等的，人人都具有这一点灵明，所有的人都只要破“法执”和“我执”二障，都能明心见性以成佛。白沙所说的心是有差等的，他认为人的“气禀习尚不同”（示学者帖）“人之赋于天者，有贤不肖贫贱富贵之差”（增城刘氏祠堂记）。圣人是天生有道的，不须在心上用功夫；贤人是自觉求道的，能够“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不道”（永嘉记）；其他人则“去圣人者远矣”（重修梧州学记）。其他人要想做圣人，要想得道，“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无远不至。修之者，治而去之之谓也。去其不如圣人者，求其如圣人者”（同上）。在他看来，圣人是天生的，圣人的心，天生和众人不同。众人要想做圣人，当然只有在心上用功夫。而在心上用功夫，越参加社会实践，就会越忙，越有损于“心”的修养。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既不要人入睡，停止“心”的思想；又能使人在心上用功夫，“去之”、“求之”。这个办法就是静坐。

静坐，其实就是一种内省功夫。在静坐中，能够使心不受外界的影响，即是“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与湛民泽）。既不必观书，也不必博识。“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与林友）。因为“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则有碍”（古蒙州学记），观书博识，就可能受外物的影响，妨碍内省功夫的进行。在“风木图记”里，白沙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具足于内者，无所待于外；性于天者，无所事于人，又非但事亲一事为然也”。

在“梦作洗心诗”里，白沙又说：

“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王；再洗日月光，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

这种洗滌，都是内省功夫，所谓“毋累于外物”（与太虚），意思就是教人忘记外物对心的干涉。但单是这样还不行，还必须做到“忘我”，才能免

受外物的引誘。怎样“忘我”呢？白沙說：

“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学孔氏者，則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慮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复赵提学愈宪）

“大抵虛已极难，若能克去有我之私，当一日万里”（与张廷实主事）

做到了物我两忘，就能化除人的私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李文溪文集序）。也就能“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同上），所謂“物我两忘，渾然天地气象”（与賀黃門）。达到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于是“人与天地同体”（与湛民澤），白沙就認為是得道了。

原来白沙所說的“道”，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東西，只是一种主观修养的境界。这种心理境界，自然是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狀，不可物的。

为什么达到这种心理境界，就認為是得“道”了呢？因为在白沙看来，天地有时而尽，万物有时而灭，所謂“微尘六合，瞬息千古”（与林时渠），只有这心的終极境界，不随天地終始；求得了这种心理境界，就可无人无我无古今。所以白沙說道无动静，道比天地大，道为天地之本，就是这个道理。白沙在“复张东白内翰”一書里說：“夫道至无而动，至近而神，故藏而后发，形而斯存”，也是这个道理。佛家說佛法之大，六合亦如尘芥；白沙的“道”，几乎和佛法是同一內容的东西；所不同的，只是：

一个是出世的，教人超脫尘凡，“如如不动”；一个是入世的，教人求为圣人，替統治階級效力。所差者仅一間耳。

白沙在“古蒙州学記”里曾經这样贊美他的“道”說：

“无我无人无今古，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兽草木昆虫一体，惟吾命之，沛乎盛哉。”

天地古今微尘瞬息，夷狄禽兽昆虫一体，惟吾命之，所以“会此，則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四方上下，都一齐牽紐，一齐收拾”（与林緝熙）。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白沙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如果說他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那末应以他舍繁求約閉門靜坐为界綫。他受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但是到了他思想成熟后，則純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白沙出身于地主階級，又在功名上不得意，这就决定他脫离生产实践，无所事事，只能在心上用功夫。他的功績只是在明初那种“朱学”盛行的社会里，能够自立門戶，独立思考，不为朱学所束縛。在当时来講，并无进步作用，如此而已。

关于白沙的哲学思想，我的看法自然是极不成熟的，但“理論与实践”既然在开展关于陈白沙哲学思想問題的討論，我也就不妨說出一些愚見，以就正于哲学史工作者。也許我将来找到新的証据，或別的同志有更充足的理由能說服我，我当然愿意放弃自己的看法，問題是在根据。

广东省工农学哲学热潮高涨

自今年7月初在广州市中一烟厂正式成立广东省第一个工人哲学小組并取得显著成績后，工人学哲学的热潮，目前在广州市和江門市正在逐步形成，其他各城市也已开始着手組織工人哲学小組。江門市人民特别是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已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至8月21日止，全市已有4,000多工人、800多机关干部（占全市干部大部分）和600多街道居民一共6,000多人参加哲学学习小組。广州市工人哲学小組在最近二个月来，也如雨后春笋，在各个工厂紛紛成立。至9月10日

止，全市共有哲学小組409个，成員达8,285人，其中有工人哲学小組315个，6,450人，占总人数的絕大部分；市郊各人民公社有9个大队成立了农民哲学小組，252人。此外，广东省番禺和揭阳两县农民对学习哲学也有良好成績，該两县的有关领导机关，正在总结农民学理論的經驗，准备积极推广。

目前正在蓬勃开展的工农群众学哲学，最基本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武器来解决实际問題。群众的学习情緒异常高涨。

（河）

短论与随笔

理論学习中的群众路綫問題

张汉青

目前正在蓬勃开展中的全党全民学理論的运动，生动地說明开展理論学习运动也必须走群众路綫，对于这一点的任何怀疑都是沒有根据的。

群众路綫是我們党的根本路綫。它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毛澤东同志以自己的全部言論和行动，証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們翻开毛澤东同志的每一篇著作，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它的灵魂，就是全国人民，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綫。因此，毛澤东同志对于什么是知識，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理論，什么是理論家，什么是理論工作，以及什么是理論联系实际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无一不是貫穿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綫精神，和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方針的。原因很簡單，因为只有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产生知識和理論的源泉；而知識和理論，归根結底是为实践服务的，它必須回到实践中去。也只有这样，知識和理論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这些問題，毛澤东同志远在十多年前，就在“改造我們的学习”和“整頓党的作风”等著作中作了极明确的指示，只是我們領会不够和貫徹不力罢了。

在前面所举的业已由毛澤东同志明确地加以解决了的一系列問題中，我觉得有一个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而又常常容易为人所忽視的，就是：什么叫理論工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工作）？这个問題不彻底弄清楚，就无法談到理論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綫。

“多少年来我都在搞理論工作，难道連什么叫理論工作都不懂嗎？”可能有人反駁。

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不懂得这点；但是，无庸諱言，我們有些同志，正是对这个似乎是老生常談的問題，弄得不大清楚，因而对其他問題，当然也就不可能解决得好。毛澤东同志拿馬克思作为

例子，告訴我們什么叫理論工作，并且指出馬克思和那些仅有書本知識的人的根本区别。他說：“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証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論工作。”^①

那末，是誰在从事实际斗争的呢？对于理論工作者來說，他應該向誰进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呢？他应加以概括的“各种东西”應該从哪里去得到呢？他得出的結論又應該拿到什么地方去“加以証明”呢？……沒有疑問，回答是群众，是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群众。因此，理論工作者必須抛弃教条主义，不停止在现成書本的字句上，而必須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調查研究，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对自已工作的檢驗。明白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理論工作者應該怎样从事理論工作的这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往往更容易為我們所忽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究竟誰最迫切要求掌握理論？我們的回答同样是群众，是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群众。特别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了国家的主人翁以后，实际生活促使他們迫切要求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坐穩天下，管好天下，因而他們也就产生了学习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强烈要求，同时实际生活中所显示出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又使他們認識到理論的重要。所以，群众是要求掌握理論的。在我們的国家里，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要求学习理論，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就决不是偶然的。例如广州市中一烟厂工人要求学哲学，揭阳县棋盤社党支書王木秀同志学理論，就是由于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和在管理国家的或集体的事业中所产生的要求使然的。我們的理論既然是从群众

^①“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839頁。

以及他們的實踐中來，那就毫無疑問應該回到他們中去，讓群眾自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一最犀利的武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對從思想戰綫、理論戰綫上反對資產階級，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殘余，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可是，在過去，我們對於工农群眾以及基層幹部的理論學習，是重視不夠的，甚至長期未予注意，眼睛只看到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這一個較小的圈子（這部分人當然是要學理論的），而未看到廣大的工农群眾對理論學習的迫切要求。這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的表現，而從思想上來檢查，不能說不是對什麼叫理論工作，以及理論工作必須走群眾路綫缺乏深刻認識的緣故。

因此，看清當前形勢，認識群眾是迫切要求學理論，要求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從而面向群眾，把群眾性的學習運動搞起來，是我們在理論工作中貫徹群眾路綫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工农群眾要求學習理論熱情可嘉，但能不能學得好呢？”有人這樣懷疑。

這裡談的是學習中碰到困難的問題。困難是存在的。正如從事任何工作一樣，在進行學習中也就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重要的還在於是否相信群眾有克服這些困難的本領。同時，我們還要具體分析一下究竟是些什麼樣的困難。

我們要相信群眾能夠克服學習中的困難。因為，既然工人農民能夠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解決了革命最根本的問題，那麼，現在有了自己的天下，有黨的領導和各種便利的條件，自己又是從事變革自然和社會面貌的實踐家，為什麼不能克服在學習理論（這種理論是從客觀實際中抽出來的）的過程中的困難呢？何況，如果把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相比較的話，前者可以說更具备了學習理論的“先天的”有利條件。毛澤東同志說過：“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而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感性知識和理性知識兩個階段構成的。只有書本知識而同實際活動完全脫離的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從書本上得到知識，“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親身得來的知識。”^①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感性知識，因而他們的知識就不完全。如果他們不自覺地到實際工作中去，就會脫離實際，成為教條主義者。這正是一般知識分子的通病。工农群眾和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則不同，他們日日夜夜都生活在實

際鬥爭之中，因而他們的感性知識（經驗）是極其豐富的。當然，只有經驗，缺乏理論，這種知識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因而就容易犯經驗主義。對於工农群眾來說，最怕的就是沒有理論學習的自覺。只要他們一旦有了學習理論的自覺要求，就會產生沖天的勁頭，他們對掌握比較完全的理論知識，也就要比知識分子深刻得多，也容易得多。因為他們是從切身的體會和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出發來學習和研究理論的。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許多工人農民對毛澤東同志著作中的哲學原理解得那麼快，那麼透徹，並且立竿見影，對生產和工作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的主要原因。

至於工农群眾文化水平較低的困難，更是可以解決的。要學理論，當然不能沒有文化。毛澤東同志也說過：“我們的工农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②問題在於我們是消極地等待工农的文化水平提高呢？還是積極地為工农群眾創造提高文化的條件。何況文化學習和理論學習也是可以同時並舉，齊頭並進的。有些工人農民同志剛脫離文盲狀態就學理論，甚至邊掃盲邊接受最基本的理論教育，而效果甚好，表示“趕我也不離開理論學習小組”，就是例證。我們堅決反對那種以背誦馬列主義條文和字句的多少，來判斷誰能學理論和學得好壞的錯誤觀點，而必須貫徹毛澤東同志關於以能否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作為學得好壞的標準的教導。“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③這點我們不應忘記。

因此，相信群眾特別是工农群眾能夠學好理論，掌握理論，同時也看到他們的具体困難，熱情地幫助他們，從他們的具体條件出發，是我們在理論工作中貫徹群眾路綫所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

此外，對於學習時間的安排，學習組織形式和方法的具体運用，不能主觀規定一套。群眾是能夠解決這些困難的。同時，要及時總結和推廣群眾所創造的好的學習經驗。

讓我們堅決貫徹黨的群眾路綫，把以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為中心的理論學習運動開展起來，遍地開花，使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學習運動中，一方面熱情地到群眾中去，拜工农群眾為師，一方面為運動的開展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①同上書第838頁。

^②同上書第840頁。

^③同上頁第337頁。

从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谈起

王 琴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学习哲学的现场会议，最近，又参加了广州哲学学会、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学术报告会，在会上，听了该厂工人哲学小组组长杨庆同志的“我们怎样学哲学”和组员胡珍同志的“学哲学的收获和体会”的报告。参加这些活动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该厂工人哲学小组，是今年六月份才正式成立的。他们围绕生产、生活、思想中存在的问题，用摆情况、提问题、抓矛盾，以及采取充分发扬民主，大鸣大放，大争大论的方法。在分析情况，解决问题的时候，又从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件找到理论根据，然后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既务实，又务虚，从实到虚，以虚带实。在一个多月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从实际出发，掌握了理论，解决了生产、生活、思想上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学哲学以前，他们不明白工厂里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问题——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之间、生产技术与生产任务之间、甚至同一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且矛盾又是不断出现的，原来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总是没个完。因为弄不明白，有些同志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免简单急躁，有时因为处理得不好，还加剧了矛盾，使问题复杂化。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道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就运用这些道理来分析具体情况，例如：杨庆同志在处理车间的工伤事故时，过去只采取简单的办法，禁止在机器运转时扫机，规定违者如发生三次事故，则医药费自理。但是，这些禁止和规定，不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还引起工人的不满。在哲学组的讨论会上，大家帮助他分析了具体情况，批判他的简单急躁的做法，指出应加强对新工人的安全教育，合理规定扫机的原则。这样，问题彻底解决了，大家都满

意。又如：厂里因生产计划经常变动，群众意见很多，但领导又强调是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经过了这个学习小组的讨论研究、调查，证明还有内因的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有不协调的原因，全面认识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从而解决了协作问题，促进生产上的跃进。

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小组的学习道路和办法是从生产上、生活上、思想上的实际问题出发，从各种复杂现象中找到关键，即矛盾的所在，为了解决矛盾，又从实际到理论。这样，学习的动机和目的，就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推进生产，提高认识，改进工作而学习理论。同时由于敢于解放思想，勇于破除迷信，很快地就学会运用理论，又反过来以理论为武器以观察和解决思想上、生产上、生活上的问题。这种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学习方法。

从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从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雄辩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哲学并不是高不可攀和神秘的东西，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可以学，而且可以学得更好。

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却完全与此相反。他们的学习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装饰门面，夸耀于人。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到书本，搬弄名词概念，他们因为脱离实际，也就不可能从实际出发。他们的公式是认识——实践——认识，甚至完全排斥实践，只是从概念到概念，这就是产生教条主义的孽根。由于立场不正确，目的性不明确与脱离实际，怎么能懂得什么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上述两种立场，两种学习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必然得出两种不同的效果。我们做理论工作，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会从实际出发，使理论联系实际。应该提倡理论走出学院，走出研究室，到工厂，到农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上海财经学院，组织两百名师生到工厂，企

业、合作社深入調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一百七十多位师生比較長期地深入农村，一面从事生产劳动，一面进行調查研究和学习教育的方法，这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种哲学試驗田，广东省教育行政学院理論教研組的同志們到广州协同和工厂工人哲学小組和他們一道学习理論，参加他們的討論，亦是值得各院校理論教研室以及理論研究部門的仿效。

理論是从实践产生的。毛主席說过，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論，必須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所以理論工作者，應該認真地对待工人学哲学、学理論的道路和方法，

到实践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那里事物的客观规律与变化，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那里是培养和鍛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极其生动活泼的场所，是知識分子改造思想的“老君爐”。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与教条主义决裂，使理論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广大劳动人民丰富的斗争經驗，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反过来指导群众的实践，并在实践中經受考驗。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革命理論的威力，才能用我們的理論武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二乘二等于五”及其他

顏 孙

“二乘二等于五”

大鬧文化革命也是階級斗争。为什么这样說？因为资产階級占有文化，却欺負工人階級沒有文化。夺回文化，就不能不是一种階級斗争。中国资产階級右派大喊：“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其欺負工人階級可謂露骨极了！我想，引用列宁的話来打他們的嘴巴，会打得响些，因而不怕修正主义者的“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老搬教条！”的詈罵，偏要作个“文抄公”，大抄列宁这番話：

“我們只是刚刚开始学习，但我們已經学得极有系統，竟使我們深信，我們一定能达到良好的成績。可是，如果我們的敌人，即资本家与第二国际英雄們，強調我們所作过的蠢事，那我为了比喻比喻起见，就来引証俄国一位著名作家的話，这句话我略加变更后，就成了这样：如果布尔雪維克做出蠢事，那么布尔雪維克也不过是說：‘二乘二等于五’；至于我們的敌人，即资本家与第二国际英雄們做出来的蠢事来，那么，在这班人那里就得出‘二乘二等于燭’。……如果我再来重复地說，我們作出的蠢事，較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所共同作出的蠢事說来，还算不得一回事，我想，这并非过甚其詞。……”

就以算数而論，工人階級确实还不如资本家那样会打算盤。解放初期，人民銀行的干部連数鈔票也不熟手，也許还有个別干部做过差不多象“二乘二等于五”之类的蠢事；可是，曾几何时？工人階級领导全国人民稳定金融物价，恢复經濟，发展生产，超额完成国民經济建設第一个五年計划，又开始实现第二个五年計划！

工人階級、劳动人民向文化、向科学、向理論进军！不要自卑，我們学习文化科学剛在开始，即使把“二乘二等于四”弄成“二乘二等于五”，也不算得一回事。不要迷信不要害怕资产階級的“專家”、“學者”們，他們会把“二乘二等于四”弄成“二乘二等于燭”！試想：究竟誰是真正的蠢才？

这种教育和那种教育

有个资产階級右派分子咀咒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指为：“用受教育少的人对受教育多的人进行最少的教育。”

这个右派分子的主观認識确实如此；而客观实际却是这样：“用受资产階級教育少的人对受资产階級教育多的人进行最低限度的馬克思主义教育。”

狂妄自大的资产階級知識分子总是以“受教育

多”为可恃，而不愿正视一下究竟所受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育，而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受到的又是怎么样一种教育。也难怪，概念的混淆常是那些自恃“受教育多”的人的本领！

列宁对于剥削阶级的教育所起的作用，作了概括而深刻的表述：“旧社会所依据的原则，不是你去掠夺别人，便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替别人作工，便是别人替你作工；你或是当一个奴隶主，或是当个奴隶。显然，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就染上了这样一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当奴隶主，就是当奴隶，或是当一个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当一个只关心自己不顾及旁人的人。”——可见，对于受这种教育多的人，不能不用受这种教育少的人来进行即使是最少的社会主义教育。要不然，有他们的那种教育，就没有我们这种教育！

所谓“黑格尔——马克思学派”

当列宁给予修正主义者迎头痛击的时候，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的开头写道：“有名的成语说得对：如果几何学定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末人们也一定要把它推翻的。”

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出于仇恨的“修正”，并不让伯恩斯坦专美于前。去年夏季“大鸣大放”中在北京大学出现过什么“黑格尔——马克思学派”，便是这样一种反动的竞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者要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这的确大大触犯了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利益。怎么办呢？那些被资产阶级教养得极为“内行”的教授先生，虽然对马克思恨之入骨，也不敢公然站出来，叫声“灭马克思，兴黑格尔”。于是，怪可憐见的，来个修正主义老祖宗的旧法宝：苦心孤诣打起“黑格尔——马克思学派”的黄旗，（这是第二国际的色彩呢！）实在是白旗。

所谓“黑格尔——马克思学派”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捧黑格尔而压马克思？右派分子用心良苦，也太大胆，幻想把黑格尔这道“符咒”来压住马克思这个“妖魔”，却不管黑格尔和马克思本人同意与否，硬替他们结亲。

黑格尔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二十岁的马克思曾是少年黑格尔左派分子之一，不久，马克思便从黑格尔哲学中批判地吸取了它的辩证法，而彻底地批判了它的唯心主义。这是近代哲学史的一点起码的常识，那些哲学“内行”的教授们不应该不知道，偏要来个“黑格尔——马克思学派”，是何道理？道理就在于列宁所说的：“如果几何学定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末人们也一定要把它推翻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触犯了右派老爷们的根本利益，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于是乎，恬不知耻，宁愿脱掉裤子光着屁股，自命为“黑格尔、——马克思学派。”

重要更正

本刊第八期“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原稿曾引用列宁的一句话：“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收买，……”，但排版时将“机会主义者”误排为“社会主义者”（见第八期第33页，左，倒数第一行），造成严重错误。特此郑重更正，并向作者及读者致歉。

广东人民印刷厂
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同启

又：本刊第七期应作下列更正：页35倒4行“方不瘳也”，应改为“方不瘳也”。页36右1行“未之贼也”，应改为“未云贼也”。页36右24行“老以尺”，应改为“若以尺”。页36右25行“从（邓”，应改为“（从邓”。页38右倒2行“心有所教”，应改为“心有所蔽”。页38右倒4行“爱主”，应改为“爱获”。页38右31行“护，人也；爱护”，应改为“获，人也；爱获”。页40左8行“辮人所裁”，应改为“辮人所载”。页41右6行“是同树种”，应改为“是因树种”。同页右16行“总和上面不同”应改为“虽和上面不同”。

問題解答

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几个問題

(續完)

問題二：为什么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

解答：这里，我們得首先来弄清楚“詭辯”与“辯証法”这两个根本对立的观念。

辯証法的原意，是指人們在辯論中用以揭露对方議論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求得真理的一种方法；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則是一种最完整的、最深刻的并且摆脱了片面性的发展学說，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維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方法。馬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思想方法来辨别真偽，分清是非，揭示真理。詭辯与此相反，是在辯論問題或在証明某一論点的时候，只从外表不从本質、只从片面不从全体（如：只要抽象原理不要具体条件，或只要特殊情况不要普遍真理等等）、离开事变的联系发展只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点；历史事实証明，这是一切无产阶级的叛徒掩盖自己的丑惡嘴臉的一种欺騙手段，是修正主义者的思想方法。

以南共綱領草案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并不比他們的老师高明，他們在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在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資本主义的时候，运用的仍然是机会主义者的詭辯术。

在臭名远扬的南共綱領草案和南共领导人的反动演說中，都充斥着这种詭辯。例如：南共綱領草案断言：“……近几十年来馬克思主义思想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了。……因此，在对现代社会問題作进一步的科学的和馬克思主义的闡明方面，特别是在闡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规律和矛盾方面出现了空白。”南共綱領草案是怎样填补这个“空白”的呢？它說：“資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証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全人类日常实践的内容和方法的时代。”因此，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既无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无须实

行无产阶级專政，只要有“资产阶级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資本主义”就够了。这正是鉄托之流的道地的詭辯。在这里，现代修正主义者用“資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資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資本主义，利用它們之間的相似之点而抽掉了它們之間的本質区别。我国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道路来改造和消灭資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实践，不正好給这些詭辯者打了一記响耳光嗎？又例如：鉄托在拉宾发表的反动演說中，为了替自己向美帝国主义卖身投靠的惡行辯解，硬把南共领导集团的投降政策同苏联的和平政策作了牛头不对馬嘴的类比。他一方面尽情地歌頌美国的小麦和金元，一方面公开地为目的在收买他国主权的“美援”辯护，說什么“我們沒有作任何这种性質的讓步，当时也沒有人向我們提出这种条件”。这也是鉄托之流的道地的詭辯。“在1921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政府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向美国的以胡佛为首的帶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的救济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讓美国的救济活动脱离苏联政府的监督。……但是鉄托之流却是怎样对待美国的援助呢？鉄托公开地謳歌美国的小麦和金元，并且以他們‘懂得’无限期地依賴美国的援助来‘维护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而自傲。”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六日社論的这一段話，就把鉄托之流的詭辯术彻底揭穿了。至于美帝国主义者——这些靠超額利潤发财的老板們，如此慷慨地发給南斯拉夫以大量的“美援”，到底有沒有条件，以鉄托为首的南共领导集团，到底有沒有讓步的問題，也是早已水落石出了的。事实上“美援”所收买的不只是南斯拉夫的国家主权，連同鉄托之流的灵魂都被收买去了。来自西方的旅客，不是已經公开地把南斯拉夫叫做“小美国”，而帝国主义者不是在大談鉄托的“价值”了嗎？这样的讓步，这样的条件，比其他接受“美援”的国家所付出的，有过之无不及，还侈談什么“维护独立”，什么“建立社会主义”呢？原来鉄托及其集团耍弄的正是离开了事变的联系发展、只从外表不从本質来辯論問題的詭辯方法。也就是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来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

問題三：为什么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

解答：我們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說的基本原理，認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

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但任何形式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调和的表现，而且归根到底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保护资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说的：“……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千方百计地隐瞒国家的阶级专政的性质，说什么“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阶级的机构了，它不再反映和维护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了”；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描写成为“日益监督资本”，“作为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它社会关系的调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的阶级调和的产物。据说，他们已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找到了“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无产阶级不必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更不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断施加压力”，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就和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一样，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所不同的，也是更可恶的，只是他们多披上一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而已。

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超阶级的反动的国家论，特别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喝采；因为当经济危机正席卷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这个时候，这种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起了麻痹和瓦解工人阶级斗争意志的作用，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服务的。

这里，还有必要略谈一下关于“国家消亡”的问题。

国家消亡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消亡是在阶级消亡和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我们是要消灭国家权力的；但国家消亡是以国内阶级的消灭和阶级影响的消灭、国外帝国主义制度的消灭为条件的，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

立刻消除的。”

那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继续强化国家机器的这个时候，大谈特谈“国家消亡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妄想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试想一下，如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听信了他们的鬼话，1956年10月的反革命暴动岂不就可以“马到成功”了么？而其实，大叫什么“国家消亡”的这些流氓们，在南斯拉夫国内却正在强化他们的反动的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着那些反对他们的人！

这就可以明白，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国家消亡论”，也是他们的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也是针锋相对的。

问题四：为什么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

解答：南共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学上为垄断资本辩护，主要是在对资本主义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因为南共修正主义者既然用超阶级的国家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就必然要进一步把这个“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与大垄断资本家的结合，即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社会主义因素”，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样，南共纲领草案就在下面这几个方面来为垄断资本涂脂抹粉作辩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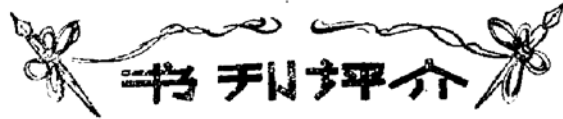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既然受“超阶级”的国家所限制和监督，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就不再是对劳动人民加强剥削与榨取的手段了。但事实上，如列宁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国家资本主义是表示，它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以拥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大垄断资本家凭借着国家的权力，或以“国家”为幌子，取得了极其优厚的利益，强迫工人工作得更紧张，以至禁止工人罢工和冻结工资，对工人实行极其残酷的榨取。因此，南共纲领草案是要掩盖垄断资本对劳动人民加强剥削榨取的事实，美化垄断资本。

其次，南共纲领草案既然认为“超阶级”的国家在“限制着私人资本的作用”，在“剥夺私人资本所有者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这样也就能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经济纳入计划，消除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这完全是替垄断资本辩护，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翻版。

最后：南共綱領草案把“国家垄断资本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也即是把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别有用心地解释为“社会主义因素”。这样，南共修正主义者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可能自发地从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原理。南共修正主义者这样做，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

的革命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可以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掩盖垄断资本作垂死挣扎时竭力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罪行。

南共修正主义者替垄断资本作这些辩护，是采用诡辩的手法，混淆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颠倒黑白来进行的。（于）



評俄譯本“中国古代思想史”

苏联 維諾格拉多娃

杨荣国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第一本译成俄文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中国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三百年间古代思想的变革、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论著。

杨荣国这本著作描写了古代中国文化生活和思想发展的情形。他用真凭实据证明资产阶级的西方中心理论的毫无根据。依照这种西方中心理论，好象在中国任何时候都没有对认识论上各问题进行过深刻的研究，所存在的只是关于理论和社会的学说。本书作者在各种原著的基础上揭露出古代中国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评述当时斗争过的各种问题，指出中国思想家在各种哲学问题的研究上的贡献，其中包括着认识论和逻辑理论上的各种问题。作者在评述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时，是以他们本人的原著为依据的，这就使他能够避免西欧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中那种流行的公式，并且使他既能指出中国哲学的一般特点，也能指出其古代各卓越代表人物的观点底特征。

作者在对古代中国的社会情况作出深刻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思想上得到了怎样的反映。

尤其有价值的，是杨荣国在其书中追寻各种哲学范畴产生的最深刻的源泉。同时作者在对古著作精密的语言学分析的基础上，对许多范畴给予新的解释。他对于五行这种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作

了寻究，揭露出古代哲学范畴的辩证性质，以及空间与时间，个别与普遍等等概念的发展。

书中对于有关中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很多新的和重要的事迹都有报导。论述孔子和墨子的第五章是本书最好的章节之一。作者确凿地指出孔子哲学系统中的进步性质，指出这个思想家在主张人道和正义的理想上和把知识对平民的传播上所起的卓越的作用。同时他也揭露出作为民族贵族代表者的这个思想家观点上所受到的历史限制。在第五章中对于“仁”和“礼”范畴的解释占了重要的地位。杨荣国也指出墨子观念中的进步思想，如他认为一切要“中万民之利”，并且在这种基础上来反对侵略战争。

作者在评论杨朱和庄周学派必须“毁灭社会制度而任其自然”的主张时，写道：“杨朱的思想在其基础上是唯心主义，与老子书中思想体系一致”。

杨兴顺教授在俄译本序言中对杨荣国此书的优点和缺点整个地作了正确的评价（请参看其对杨荣国此书用中文写成的详细评论，载在一九五五年哲学问题杂志第一期），他举出老子哲学中另外的一些思想。杨兴顺写道：“对于拥护‘道’的理论的人的哲学思想评价是有争论的。目前中国学者大多数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老子学说包含原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我们觉得，这些原则并不彼此矛

盾，因为杨荣国也指出，老子学说中包含自发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于“道”和“气”的哲学范畴的探讨上。这些范畴以后得到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探讨这些范畴的过程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斗争。

“道”的学说在惠施公孙龙学派中得到继续发展和逻辑论证。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齐多为一。这个学派多注意于逻辑问题，和对于同与异，同一性和对立性，质与量等等逻辑范畴的探讨。

在评述墨者学派时，作者说明，他们是在发挥墨子的积极思想。在他们著作中，利民这种正义性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者指出墨者对惠施和公孙龙思想的斗争，他们从“正规现实”的立场，揭穿惠施和公孙龙的诡辩术和他们关于物体之质的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

关于评述荀子思想及其对于“礼”与“法”范畴的探讨这一章，很有兴趣。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同时对于孔子门徒主张复古的一些反动思想提出了批评。荀子把“礼”的范畴和“法”的范畴

看成是同一的东西。

杨荣国在其书中不仅阐明了荀子的社会学的思想，并且也阐明了荀子的认识论的观点。韩非发展了荀子的思想。杨荣国写道：韩非“只是为当时新兴的力量——新兴的地主层势力——来立法，要为他们立法中打破这早已腐朽了的种族奴隶制”。

这样，在杨荣国书中，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就得到了恰当的阐明。

杨荣国这本书对于讲授中国哲学史专门化课程和一般课程中相当于这一部分的高等学校教师以及研究哲学史的学生来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本书对于关心中国、印度及其他东方各民族哲学史问题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也有重大的意义。（郭威白译）

（编者按：杨荣国同志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去年出版了俄文译本，在苏联读者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哲学问题”曾先后发表两次评介，现选译在该刊本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娃的评论一篇，供读者参考。）

广东省积极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工作

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基础上，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重整队伍，组织黎族、京族和综合组，于8月21日分别出发前往海南岛、粤北连县自治区等地展开调查研究工作。

参加这次调查的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和广州华南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师生25人。

该组为了今后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出发前，曾作短期集中，学习了有关民族政策的文件和认真讨论了今后工作的跃进规划、调查提纲、编写黎族、京族简史简志提纲及其他各族（瑶、僮、回、畲、满及苗）搜集资料提纲，并着重批判和明确了过去广东组调查工作中存在着“三脱”（脱离党的

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错误，吸取教训；提出了必须坚决服从当地党委领导，做到人人政治挂帅、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今后工作必须实现“五结合”和“四边”，就是要做到密切结合当地中心工作；结合体力劳动；采取重点深入和点面相结合；调查与研究相结合；把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与编写黎族、京族简史简志及各民族概况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工作过程中要边调查、边研究、边整理、边编写。大家一致表示鼓足干劲，苦战半年，完成广东全省少数民族调查和编写工作。在1958年底以前写出京族简史简志，1959年3月以前写出黎族简史简志和广东省各少数民族概况，并写出全部调查报告，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的献礼。（保云）

廣州哲學學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廣州哲學學會。

第二條 本會的任務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貫徹理論密切聯繫實際和“百家爭鳴”、“厚今薄古”的學術研究方針，團結全省哲學工作者從事以下各項工作：

一、組織和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和毛主席著作的研究；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及廣東地區實際工作中有關哲學問題的研究。

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

三、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和普及工作。

四、調查、收集、整理和匯編有關哲學的資料。

五、與全國各地及本省各地區哲學工作者組織建立聯繫。

第三條 凡對哲學有興趣，並具有一定理論水平，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與執行本會決議者，由會員二人介紹，經理事會審查批准後，即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會，其任務為擬定本會工作計劃；检查工作計劃的執行情況；選舉理事會；討論會員所提出的研究論著。

第五條 本會設理事會領導本會工作。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21人組織成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由理事會選出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負責指導與處理本會一切經常工作。

第六條 本會辦事機構，根據工作的需要，由理事會決定建立。

第七條 本會會員均有下列權利與義務：

一、參加本會組織的各種學術活動。

二、有選舉權和被選權。

三、使用本會有關資料。

四、對會務提出各種批評與建議。

五、執行本會所布置的各項工作任務。

第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每人每年繳納會費一元；

二、必要時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撥款補助之。

第九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半年召開一次。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以上會議必要時得由會長臨時召集之。

第十條 本簡章經會員大會通過生效，如有修改須經會員大會通過。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投稿。

(二) 本刊特別欢迎下述性质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特別欢迎闡明毛澤东同志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学习心得等稿件。
2. 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要求尽量精簡，一般不超过六千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理論与实践

月 刊

1958年第9期(总第9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9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